

分类号 C91

学校代码 86406

UDC 304

密 级 公 开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硕士学位论文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的治理研究

——以肇庆市 X 村为例

A Research on Solutions For “The Exodus” Phenomenon In
Labor-Force-Export-Intensive Villages
A Case Study On X Village in Zhaoqing

学科专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广东实践研究

作 者：陈曦

学 号：81290307

申请学位：法学硕士

指导教师：文小勇 教授

入学时间：2012 年 9 月

论文完成日期：2015 年 5 月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的治理研究
——以肇庆市 X 村为例

A Research on Solutions For“The Exodus” Phenomenon In
Labor-Force-Export-Intensive Villages
A Case Study On X Village in ZhaoQing

陈 曜

答辩委员会主席:

陈金龙

2015 年 5 月

目 录

摘 要.....	1
Abstract.....	11
第1章 引 言.....	1
1.1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1
1.2 概念界定	1
1.3 理论介绍	3
1.4 文献综述	5
1.5 研究方法	13
1.6 研究思路	14
第2章 核心问题与案例选择.....	15
2.1 核心问题	15
2.2 案例代表性分析	16
第3章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的主要表现.....	19
3.1 X 村的经济基础分析.....	20
3.1.1 假设推论	21
3.1.2 实证研究	22
3.1.2.1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22
3.1.2.2 模型选择	22
3.1.2.3 变量解释	23
3.1.2.4 模型估计结果	24
3.1.2.5 结果分析	25
3.2 X 村社会结构分析.....	28

3.2.1 性别比的失调	28
3.2.2 X 村人口年龄结构	31
3.2.2.1 X 村已进入年老型社会	33
3.2.2.2 X 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	34
3.3 X 村的政治参与分析	35
第 4 章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的原因及影响	38
4.1 X 村经济基础对该村社会问题的影响	38
4.1.1 X 村收入、职业结构与性别结构的关系	39
4.1.2 X 村收入、职业结构与老年人照料问题及留守儿童问题的关系	41
4.1.3 X 村收入、职业结构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42
4.2 X 村经济基础对该村政治参与的影响	43
4.3 本章小结	44
第 5 章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的治理建议	46
5.1 承接劳动密集型企业	46
5.2 发展土地入股	48
5.3 政府的作用	50
5.3.1 政策支持	50
5.3.2 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水平	51
总 结	54
参考文献	55
附件	59
 村情调查问卷	59

问卷说明	61
个人简历	63
后记	64

图表目录

表 1: X 村详细人口分布情况.....	20
表 2: 变量及其含义.....	23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4
表 4: 各变量相关性.....	24
表 5: 回归模式摘要.....	24
表 6: 回归系数.....	25
表 7: X 村适婚年龄以上各年龄段未婚人口分布情况	28
表 8: X 村 1984-2013 年新生儿性别分布情况	29
表 9: X 村 2010 至 2013 年人口迁出情况	30
表 10: X 村 2010 至 2013 年迁出女性年龄分布情况	31
表 11: X 村人口年龄结构表	32
表 12: X 村劳动力资源受教育水平分布情况	35
表 13: X 村村委会干部基本情况表	36
表 14: X 村党支部会议参会者年龄情况表	37
图 1: X 村 2010 至 2013 年女性人口迁出原因情况	31
图 2: X 村人口年龄结构条状图	33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的治理研究

——以肇庆市 X 村为例

摘要

我国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经过 30 年的演变，“空心化”趋势已然十分严重。这给这些村庄的治理带来了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村庄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参与等方面。在对 X 村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空心化”对该村的影响主要有：经济基础方面，农村人口的大量外迁造成了农村生产资源（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大量流失，造成农村经济的萧条。社会结构方面，由于人口外迁造成的人口结构（如性别比失调，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和留守儿童缺乏照料等）的不均衡，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政治参与方面，人才的流失造成了村庄治理人才的匮乏，农民的大量外出，使得农村基层民主参与度的低下。不过，虽然村庄“空心化”造成的后果与表现形式十分复杂多样，但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农村和城市，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间比较利益落差的巨大，造成的农村人口大量外迁。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统筹兼顾的思想对该村提出了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发展土地入股，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和公共物品投入的治理建议。首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可以吸引大量的女性劳动力资源，从而调节该村的性别比；引进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就在村里，有利于解决该村老年人口和留守儿童的陪伴问题；降低村民外出务工的成本。其次，综合考虑该村非农就业人口的增多，人口老龄化和村民的“弃农”情绪，将来从事种植业的人口必将越来越少，发展土地入股契合这一趋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政府的支持，因为上述治理策略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不可能达成的。如果政府不在农村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公共物品方面进行投入，农村要想完全靠着自己的生产要素发展是很困难的。

【关键词】空心化 经济基础 社会结构 政治参与 治理

A RESEARCH ON SOLUTIONS FOR “THE EXODUS” PHENOMENON IN LABOR-FORCE-EXPORT-INTENSIVE VILLAGES

A CASE STUDY ON X VILLAGE IN ZHAOQING

Abstract

Having undergone 30 years of evolution, a drift to the phenomenon of “The Exodus” has become seriously troubling in the labor-force-export-intensive villages in China, causing various problems for governance. These problems are manifold, including aspects such as economical foundation, social structure, political engagement, etc. An on-site survey of X Village has revealed the following impact of “The Exodus”. On the economical ground, “The Exodus” results in massive loss of resources including labor power, money and technique, which contribute to a desolate economy in the village; In terms of social structure, an imbalance in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is caused by unbalanced gender ratio,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lack of care for the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And it in turn affects social stability. As far as political engagement goes, “The Exodus” means a deficiency of managing talent in the village. It also discourages the remaining populatio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democracy. Despite “The Exodus” various form of expression, lies in its core is the income discrepancy between participating in the primary sectors and in the second and the tertiary sectors, which is also the ultimate reasoning for the massive population export from the villages.

Aiming at these problems of the village, the paper offers a proposal of carrying on the labor intensive enterprise, developing the polling of land, strengthening the input of the policy and public goods by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ought of making overall consideration. At first, the labor intensive enterprise would attract a lot of female labor, which is good for adjusting the gender ratio of the village. The enterprise introduced is local in the village, and

it is helpful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lderly and children lacking of accompany, and reduce the cost of working out. Secondly, considering the increase of the non-farm population,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mood of “ abandoning farmer ” overall in the village, the crop engaged in agriculture will decrease less and less in the future. Developing the pooling of land is suit to this tide. Last,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supporting of the government. Because all the governance tactics above will not come true without the supporting of the government.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invest in the fields of the rural infrastructure, med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he village development will be hard only relying on their own production factors.

【Keywords】the exodus; economical foundation; social structure; political engagement; governance

第1章 引言

1.1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的趋势日趋严峻。这给这类村庄的治理带来了不小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村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参与。

1984年后，我国逐步放宽了农村人口进城的限制，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这与农村人口结构的性别比开始偏高、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增多、人才流失等问题显现几乎是同步的。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分析这些经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

其次，本文所研究的村庄——X村，属于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型村庄¹，这类村庄也不例外的拥有上文提到的各种问题。对于这类村庄，提出治理建议以应对这类村庄的治理问题是本文的另一个目的。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

首先，农村人口问题是村庄发展的核心问题。村庄的经济、社会，政治参与等方面都与其人口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改善人口结构对农民增收、解决性别比失衡、老年人缺乏照料、留守儿童、人才流失等问题都有着重大的作用。

其次，不同类型的村庄解决各自的问题应该联系本类型村庄的实际情况提出治理建议。本文在对X村的各种问题分析基础上，对人口输出型村庄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治理建议，会对该村以及该类型村庄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2 概念界定

1、劳动力输出型村庄

劳动力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实际统计中，考虑劳动年龄和劳动能力两个因素

¹见本文概念界定（P3）。

的指标有劳动年龄人口和社会劳动力资源总数¹。

劳动力输出则是劳动力空间流动的一种形式。根据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²，劳动力的流动必然是由于输出地的推力或者输入地的拉力，亦或是二者双向作用造成的。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则是这一流动的起点——输出地。这类村庄普遍不算富裕，或者没有城市富裕。这在经济因素上，才能给予这类村庄的劳动力以推拉力。并且，要称为劳动力输出型村庄，还必须有一定的输出规模（从少数人的个别行为自然不能说明一个村庄的类型），或者劳动力输出所带来的收入是该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2、村庄“空心化”

我国学界目前对村庄“空心化”的概念并未完全统一。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定义。

如从刘彦随、刘玉、翟荣新³（2009）认为村庄“空心化”，是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人口非农化，造成的农村“人走屋空”，住宅“建新不拆旧”，村庄用地闲置废弃，以及用地规模扩大的“外扩内空”的过程。徐勇⁴（2000）则从经济、政治、治理的角度认为村庄“空心化”是由于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大量流失造成的村庄治理可用手段的匮乏状态，村庄陷入“有流动不发展”的困境。周祝平⁵（2008）从人口学的角度认为，村庄“空心化”是村庄青年劳动力大量外流，造成的村庄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问题以及性别比失衡的现象。

笔者认为概括比较全面也比较适合本文引用的是刘祖云、武小龙⁶（2012）对村庄“空心化”的界定。他们认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由于农业经济和农民就业结构的转变，从而劳动力、资金、技术的流失造成的村庄发展缓慢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村庄人才、产业、社会结构、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空心化”。

¹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商务印书馆, 2012.

²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42.

³刘彦随、刘玉、翟荣新. 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与整治实践[J]. 地理学报, 2009 (10) :1193-1202.

⁴徐勇. 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02）：5-10.

⁵周祝平. 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 人口研究, 2008 (02) : 45-52.

⁶刘祖云、武小龙. 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殊途而同归——基于研究文献的理论考察[J]. 行政论坛, 2012 (04) : 82-88.

3、治理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¹”（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地被应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统治”和“治理”交叉使用，普遍认为治理和统治是一个意思，而事实上，他们是有区别的。统治倾向于以国家强制性来管理控制国家，是与国家相伴而生的，统治的主体必定是政府，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的方式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单向度的管理；而治理则强调公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二者合作，在管理方式上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确立共同目标和伙伴关系来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²。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治理做出了许多新的阐述。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西瑙³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他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题未必是政府，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罗茨⁴对治理的理解是：“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到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⁵。

1.3 理论介绍

1、比较利益理论

配第认为从事制造业比从事农业，进而从事商业比从事制造业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农业人口会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⁶。

这一理论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揭示了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的原因。这一理论于本文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一理论适用于我国现实状况。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

¹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

²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

³罗西瑙：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M].剑桥大学出版社，1995:5.

⁴罗茨：新的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05): 42-48.

⁵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

⁶杨先明等.劳动力市场运行研究[M],商务印书馆, 1999: 97.

构依然明显存在。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从事农产品生产者收入低，享受的社会福利少。而另一方面，从事二三产业人口，收入较高，享受的社会福利较好。这必然导致从事农业生产者希望向二三产业转移。也就是说在我国产业间比较利益的差异是存在的，这是运用比较利益理论的基础，也是我国目前的现实。其次，这一理论支持了本文的逻辑基础。本文的逻辑结构是建立在存在农村劳动力资源大规模向城市流动现象这一前提之上的。因为本文所讨论的农村性别比失衡、老年人口缺乏照料、留守儿童、人才流失等问题都是由于劳动力资源大规模流向城市造成的。而配第的比较利益理论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大量流出的原因，支持了本文的这一前提。

2、推拉理论

由雷文斯坦（RavenStein）提出。这一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存在着两种动因，一是居住地推动人口迁出的力量；二是，迁入地吸引人口迁入的力量。两种力量的共同或单方面作用导致了人口迁移¹。

这一理论与配第的比较利益理论的内核其实是相通的。配第的比较利益理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第一二三产业间收益存在落差。正是这落差使得劳动力资源依次向二三产业流动。而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也是异曲同工的。劳动力“推出”地和“拉进”地之间也存在着落差。也正是这种落差使得劳动力资源向“拉进”地转移。他们的理论成立的前提都是产业间或地区间存在落差。

而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一、配第的比较利益理论侧重的是产业间的人口转移。而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侧重的是实际地区间的人口转移。二、配第的比较利益理论是从纯经济因素的角度论述人口转移的原因。而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则不局限于经济原因。其理论认为，生活环境、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等因素都是人口转移的原因。比如一个地方，教育发达，那么那些注重教育的家庭也有可能从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转移过来。因此，这一理论不光从转入地和转出地差别的角度分析人口迁移现象，更加注意到了转移人口的主观需求的差别。

这一理论于本文的作用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同配第的比较利益理论一样，可以支持本文的逻辑基础——农村劳动力资源向城市转移现象的存在。其次，文中论述的适婚年龄女性人口大量迁出及人才流失等现象都可以用推拉理论进行解释。

¹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42.

1.4 文献综述

徐勇¹ (2000) 认为, 受城乡结构, 土地制度等因素制约,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有很强的“空心化”趋势, 由此产生了农村经济发展滞后, 治理成本升高, 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周祝平² (2008) 研究发现, 村庄“空心化”带来的具体表现包括: 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 (治理人才流失), 农村养老问题凸显, 土地制度调整难度加大, 农业生产福利化等。唐华清, 袁艳萍³ (2011) 认为, 村庄“空心化”妨碍了农民的组织化。刘鸿渊⁴ (2011) 研究发现, 村庄“空心化”制约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

1、农民外出务工对村庄经济基础影响的研究

对于影响农户收入因素的归纳, 已有研究已经十分全面。王凤⁵ (2005) 认为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是单位农产品增加值, 农产品总量和农业人口数量。张改清⁶ (2005) 则把农户的投资看做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李实⁷ (1999) 认为由于劳动力外出务工, 劳动力的流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宋莉莉⁸ (2011) 在实证研究中发现,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的长短, 以及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洪自同⁹ (2012) 在对福建省农户的实证研究中发现, 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 以及承包土地数量对农户种植水稻面积有显著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 户主健康水平, 农机拥有量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高新才, 滕海峰¹⁰ (2011) 认为土地要素条件 (面积大小, 肥沃程度, 是否靠近水源等) 与农民外出务工概率呈反比, 但是对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时红艳¹¹ (2011) 在对陕西省安康市农户的实证研究中发现, 外出务工因素、劳动力数量、家庭资产因素等都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但是教育水平、风险因素等对农户收入有

¹徐勇. 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0 (02) :5-11.

²周祝平. 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J]. 人口研究, 2008 (02) : 45-52.

³唐华清, 袁艳萍.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J]. 改革与战略, 2011 (12) : 103-107.

⁴刘鸿渊. 贫困地区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J]. 求实, 2011 (03) : 28-30.

⁵王凤.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决定因素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学家, 2005(5): 66-71.

⁶张改清. 农户投资对其经济收入增长的作用研究[D]. 浙江大学, 2004.

⁷李实.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2) :16-32.

⁸宋莉莉.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及差异研究[D].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1.

⁹洪自同.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研究[D]. 福建农林大学, 2012.

¹⁰高新才, 滕海峰. 土地要素对农户就业行为及农户收入影响研究——基于甘肃省青城镇344家农户调查[J]. 西北人口, 2011, 32 (3):108-111, 116.

¹¹时红艳. 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陕西省安康市3县1106个农户的调查与分析[J]. 学术论坛, 2011 (4) :158-163.

负向影响，且影响不显著。高梦涛¹（2005）认为农户男性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男女劳动力性别比在 101-105.7 之间是最优的。如果男女比例失调，男性劳动力过多，反而会对农户收入产生负向影响。

按照配第²的比较利益理论逻辑，以及上述其他学者所认为的农民越是农就业，收入越多。那么，促进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因素（比如种粮补贴，家庭承包土地量，土地肥沃程度等要素）是否会减少农民非农就业的积极性？是否会使农户收入降低呢？如董春玉，刘颖³（2008）在对安徽天长市农村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农业补贴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相对降低了农民非农就业的积极性。由于非农产业比较利益较高，因此，种粮补贴反而在农户增收中产生了负效应。余建斌，韩瑞宏⁴（2010）有相反的看法，他们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得出种粮补贴资金无法抵消种粮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比较利益依然偏低，无法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结论。罗峰，黄丽⁵（2012）的研究中发现广东种粮补贴政策实施后，全省种粮面积，粮食总产量依然持续下滑。这说明种粮补贴额度较低，无法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至于家庭承包土地量是否会对农户非农就业积极性起到负向作用呢？Zhao⁶（1999），蔡昉，都阳⁷（2002）认为这样的效应是存在的。因为农民有自己的择业偏好，当土地收入变高时，自然会提高土地种植的积极性。不过，也有的研究者持怀疑态度。如 Li，Zahniser⁸（2002），盛来运⁹（2008）等则认为土地面积对农户的非农就业积极性不存在显著影响。这是因为，他们调查的农村机械运用程度较高，所以劳动力要素投入较少就可以种植面积较大的土地了。樊新生，李小建¹⁰（2008），高梦涛，姚洋¹¹（2006），则认为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非农就业收益较高等原因，土地要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在逐渐

¹高梦滔. 劳动力性别比例与农户长期收入：中国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05（9）：24-32.

²转引自杨先明等. 劳动力市场运行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9：97.

³董春玉，刘颖.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来自安徽省天长市的实证检验[J]. 南方农村，2013（8）：29-33, 43.

⁴余建斌，韩瑞宏. 种粮补贴政策对广东省农户种粮收益的作用效果与政策建议[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 31（4）：429-433.

⁵罗峰，黄丽. 发达地区种粮补贴政策体系及其效应分析——基于广东省的实证分析[J]. 南方农村，2012（6）：58-61, 78.

⁶Zhao. Y. H.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2）：281-286.

⁷蔡昉，都阳. 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J]. 中国人口科学，2002（4）：1-7.

⁸Li. H. Z&Zahniser. S. The determinants of temporary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J]. urban studies, 2002（12）：2219-2235.

⁹盛来运.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07（3）：2-15.

¹⁰樊新生，李小建. 欠发达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8（3）：16-23.

¹¹高梦滔，姚洋. 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 2006（12）： 71-80.

消减。并且，这一趋势可能会持续增强。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发现，农户劳动力人数，男性劳动力人数，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种粮补贴水平，农户资产，土地要素条件，外出务工水平等因素都会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但是由于调查地，调查对象，研究方法的不同，不同研究得出的各种要素对农户收入影响的显著性有所不同。

农民职业的分化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农户职业分化的本质是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配第¹的《政治算术》一书，阐明了农民转投非农产业，从而提高收入的机制。产业间比较利益的差异，是农业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的根本动力。科林·克拉克²在配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而后进一步向第三产业流动。刘易斯³提出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表现在存在对立的两个部门。分别是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在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果把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则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也就瓦解了，变成一元结构。

陆学艺⁴（1989）认为农民职业的分化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为松动了二元经济结构，解放农民；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促进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等。透过这些表现形式，所反映出来的实质是农民增收。冉志，郑万军⁵（2006）认为农民职业分化是农民转投第二、第三产业，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农民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为农民增加了大量的经济收入。外出打工成为了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所以应该促进农民的职业分化。温莲香⁶（2006）认为农民的职业分化有利于缓解人地矛盾，使农民收入多元化，有利于农民增收。李雪，穆利军⁷（2008）认为农民职业分化的主要意义在于使农民生活宽裕；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提高农民素质。周世强⁸（2010）认为农民的职业分化有利于缓解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¹转引自杨先明等. 劳动力市场运行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9：97。

²彭薇，王旭东. 多学科视野下的社会保障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68。

³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38。

⁴陆学艺. 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J]. 社会学研究，1989（6）：1-14。

⁵冉志，郑万军. 我国农民职业分化探析[J]. 江南大学学报，2006, 5(1):42-45。

⁶温莲香. 农民阶层分化与“三农”问题的思考及对策[J]. 理论与现代化，2006(1):45-51。

⁷李雪，穆利军. 社会学视角下农民职业分化的功能分析——以安徽省六安市花园村为例[J]. 传承，2008(5):122-123。

⁸周世强. 农民分化对城乡二元结构变迁趋势的影响[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 27(2):1-2, 5。

由上可知，农民职业分化程度越高，则意味着农民收入越高。Adam¹(2004)发现，中国农民在非农就业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在本地从事非农职业，而不是远走他乡。这说明，我国当前依然应该促进农民职业分化，使农民兼业化，脱农化，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2、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给村庄带来的社会问题研究

我国农民职业结构已存在分化，而外出务工既是这种分化的具体表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不仅给农户带来了经济上的利益，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

(1) 对性别比的影响

佟新²(2000)编著的《人口社会学》总结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不外乎三种原因，一是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调；二是两性死亡率影响；三是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

人口迁移是影响性别比的重要因素，Marcia, Paul³(1983)在对美国加州自1850年以来的人口性别比做分析时发现，移民，尤其是男性移民对该州的人口性别比影响颇大，最高时曾达到1228。我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民工的大量入城，也造成了各地不同的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刘娟，黄慧玲⁴(2011)认为，首先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性别比呈双向影响；其次，迁移人口性别比本身也不均衡。这造成人口迁移可能对迁出地或迁入地性别构成有很大影响，有可能导致地区间、城乡间人口性别比失调。至于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的性别比，则受到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影响。如台湾地区，台北市的性别比仅为96.5，而澎湖县得性别比则高达143.5⁵。大陆地区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东莞市的性别比仅为89.02⁶。而西部地区的性别比之高令人担忧，兰州为196，西宁为173，格尔木为155，银川为216，拉萨为232，乌鲁木齐为204⁷。这些数据说明由于劳动力市场对迁移人口性别的影响，从而对迁入和迁出地人口性别比造成影响的机制。不过，女性人口迁移不仅受到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影响，还受到婚嫁原因的影响。Ravenstein⁸提出的

¹Zhuo Adam Chen, Wallace E. Huffman, Scott Rozelle. Migration And Local Off-Farm Working In Rural China[Z].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Danver:2004.

²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45.

³Marcia Guttentag, Paul Second. Too Many Women?The Sex Ration Question[M]. SAGE: 1983: 34.

⁴刘娟，黄慧玲. 人口迁移与性别比关系研究评述[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27 (2) : 46-49.

⁵韩昱, 郑启五. 台湾地区人口省内迁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当代经理人, 2006 (2) : 4-5.

⁶张善余, 俞路, 彭际作. 当代中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5, 11(2): 13-19.

⁷马戎, 马雪峰. 西部六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综合报告[J]. 西北民族研究, 2007 (3) :135-175.

⁸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42.

人口迁移法则认为，女性人口在短距离迁移中更加活跃。这其中就包括了婚嫁的原因。Ravenstein 还提出了推拉理论，根据推拉理论，较贫穷地区的女性更愿意嫁往较富裕的地区。这就造成了较贫穷地区性别比较高的现象。

（2）对老年人口照料的影响

随着人口寿命的不断增加，现阶段我国的老龄人口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65岁至74岁为低龄老人，75岁以上为高龄老人¹。研究发现，越是发达的社会，老龄人口的护理成本也就越高，发达国家65岁老龄人口的平均开支大约是15—64岁年龄层五倍。老年人的护理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老龄人口的增加使家庭在这两个层面都越来越难以支撑²。

在外出务工对老年人养老的影响上，高建新，李树苗，左冬梅(2012)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大量外出务工，老人在家养老已成为儿女的负担。当儿子全部外出务工时或女儿全部外出务工时，子女们都倾向于不照顾年迈的父母。他们还认为，中国人传统观念普遍认为赡养老人是儿子的责任，由于外出务工的男性的增加，子女间对照料老人的推诿可能性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子女外出务工，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可能对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提供更好的支持。Susan L. Ettner³(1996)认为子女职业与其对老年人的赡养方式有很大的联系。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照料时间同其工作的地点远近，忙碌程度呈负向关系。这种负向作用对女儿的影响更加显著。女儿一旦外出务工，就很难再照顾父母，这就只能靠其他的兄弟姐妹来弥补，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因此，外出务工女性的增加也可能增加子女互相推诿照料责任的可能性。Lee. Y., W. Parish, R. Willis⁴(1994)在对台湾老年人的研究中发现，子女更倾向于用经济和物质上的付出来取代与照料父母的时间投入。这说明子女经济能力的增强可能会影响他们对老人照料的时间投入。罗芳，彭代彦⁵(2007)认为，农村子女外出务工对父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子女的经济能力增强有助于他们为父母提供更好的物质供养。其次，子女外出务工会大大降低他们照料父母的精力和时间，对于那些年迈多病的失能老人，影响很大。最后，子女长期

¹ 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25.

² 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30.

³ Susan L. Ettner. 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Elder Care[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6(1):189–205.

⁴ Lee. Y., W. Parish, R. Willis. Son, Daughter, and Intergeneration Support in Taiw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4):1010–1041.

⁵ 罗芳，彭代彦.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空巢”家庭养老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7(6):21–27.

外出务工，会使父母怅然若失，孤独感增加。这三方面对父母影响的大小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老人的经济、身心健康状况，子女的经济状况，老人的子女数量，老人是否有配偶等。

综上所述，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状况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比如子女收入的增加会给老人带来更好的物质支持。但是，子女不在身边又会给老人带来照料缺失和精神上的影响。利弊大小难以判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存在一种既可以增加子女经济收入，又可以保证子女对父母的照料和陪伴时间的办法，那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3）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影响

在对留守儿童的认定上存在着不同的标准。有的学者如周宗奎，孙晓军等¹（2005），段成荣，周福林²（2005）认为，父母双方有一方在外务工的农村儿童就可以认定为留守儿童。而有的学者如林宏³（2003）则认为，父母双方均在外务工的农村儿童，才能认定为留守儿童。此外，在父母外出时间的长短上，儿童年龄上也有不同的标准。由于标准的不同，也必然造成了统计结果的各异。有的调查如《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5日刊载《1000万“留守儿童”期待关爱——教育部召开座谈会就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请专家建言献策》提及我国留守儿童只有1000万左右。全国妇联⁴的统计结果则为5800万。

学界对造成留守儿童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则有较高的共识。如赵富才⁵（2009），李庆丰⁶（2002），朱科蓉，李春景，周淑琴⁷（2002）等都认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务工是造成我国留守儿童的最主要原因。

留守儿童问题是社会问题。其主要的危害表现在对留守儿童成长方面。叶敬忠⁸（2008）认为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情感、安全等方面都造成了影响。段成荣，周福林⁹（2005）把这种危害归纳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认为留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自我保护能力都较弱。周宗奎，孙晓军¹⁰（2005）则认为，监护的缺失，使

¹周宗奎，孙晓军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1）：71-79.

²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5（1）：29-36.

³林宏.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现状的调查[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3）：132-135.

⁴全国妇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I].中国教育新闻网.2008.2.27.

⁵赵富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9.

⁶李庆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J].上海教育科研，2002（9）：25-28.

⁷朱科蓉，李春景，周淑琴.农村留守子女学习状况分析与建议[J].教育科学，2002（4）：21-24.

⁸叶敬忠.关爱留守儿童——行动与对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7.

⁹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5（1）：29-36.

¹⁰周宗奎，孙晓军.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1）：71-79.

得留守儿童容易有越轨行为，极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赵富才¹（2009）利用详细的数据，证明了留守儿童学习成绩明显不如非留守儿童。

对于如何解决或是缓解留守儿童问题。不同的研究也有不同的对策。殷世东，朱明山²（2006）认为政府应该在农村教育上加大投入，是农村儿童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吴霓³（2004）认为应该在户籍改革上做文章，使农民工子女随迁更加方便。还有其他对策如迟希星⁴（2006）认为应加大对留守儿童教育，使其理解，体谅自己的父母。

（4）对人才流失问题的影响

对人才的界定随着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近年有所变动。按照 1982 年的人才标准，具备中专及中专以上学历或者拥有初级或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2003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中更加全面的提出要把能力和绩效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过由于对能力和绩效的评判标准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大多研究在讨论农村人才流失这一问题时，依然主要把学历作为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

杨仁德等⁵（2010），刘成文，张英魁⁶（2008）的研究用数据证明了我国外出务工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比全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状况明显高些。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不仅是农村中有年龄优势的那部分人，也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

至于农村人才流失的原因，已有文献普遍认为经济原因是主要原因。如李小棒，柳玉民⁷（2013）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村收入偏低是造成人才更愿意流向城市的根本原因。张仁汉⁸（2008）把人地矛盾、国家政策因素也当做影响人才流失的客观原因。并且指出农村人才流失会带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农村组织涣散、村庄治理人才匮乏，现代农业缺乏智力支持等问题。

对农村人才流失问题的解决策略，也是大同小异的。如张慧芳⁹（2008），张仁汉¹

¹赵富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9.

²殷世东，朱明山.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基于皖北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 2006 (2) : 14-16.

³吴霓, 丁杰.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调研报告[J].教育研究, 2004 (10) : 15-18.

⁴迟希星.留守儿童教育成长问题的心理社会分析[J].江西教育科研, 2006 (2) : 29-32.

⁵杨仁德等.农村人才流失问题与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 2010 (12) : 4429-4431.

⁶刘成文, 张英魁.破解新农村建设中人才流失刍议——以 ERG 理论为视角[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 : 43-47.

⁷李小棒, 柳玉民.农村人才流失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J].农业经济, 2013 (2) : 54-55.

⁸张仁汉.新农村建设中人农村“才流失”问题探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08.

⁹张慧芳.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才流失”问题探究[J].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 : 47-52 (58) .

(2008) 都提出要改善农村生活、加大农业生产投入, 教育投入, 引导大学生向农村流动等。刘传初² (2006) 则认为要对农村人才细分为实用人才, 干部人才, 经营管理人才等, 针对各型人才提出相应策略。

3、文献述评

陆学艺, Mohapatra, Rozelle and Huang 等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我国农民身份实际上已发生分化, 并对其进行了划分。他们划分的普遍依据是, 农民从事职业的不同。学界普遍认为农民职业的分化有利于农户增收。其原因可以用配第的比较利益理论进行解释。

随着农民的职业分化, 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总结其他学者的成果, 这些因素主要有农户劳动力人数, 男性劳动力人数, 受教育水平, 健康水平, 种粮补贴水平, 农户资产, 土地要素条件, 外出务工水平等因素对农户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其中对于土地要素, 种粮补贴两个因素, 不同学者由于调查地, 调查对象, 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了向左的结果。这说明, 我国不同地区, 不同文化的村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 同样政策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过, 学界普遍认同非农就业这一因素, 对农户收入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不过, 任何事物都存在利弊。农民外出务工虽然可以从事比较利益较高的非农职业。但是, 由于人口大量向外迁移, 也造成了棘手的问题。比如农村性别比失衡的问题。Marcia, Paul, 刘娟, 黄慧玲等认为人口迁移是农村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这是由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并且根据 Ravenstein 提出的推拉定理, 年轻女性更愿意嫁往富裕的地区, 这就造成村庄, 尤其是贫困的村庄, 女性大量外流的现象。由此, 村庄的“光棍”越来越多。

农民大量外出务工还会产生农村老年人口缺乏照料的问题。综合已有观点, 我国老年人, 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目前的主要养老方式依然是家庭养老和个人养老。子女外出务工对他们的养老状况有着很大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 这些影响有两面性, 有的影响是积极的, 有的影响是消极的。比如子女收入的增加会给老人带来更好的物质支持。但是, 子女不在身边又会给老人带来照料缺失和精神上的影响。并且高建新, 李树茁, 左冬梅, Susan L. Ettner 等认为子女大量外出务工可能会使子女间互相推诿照料责任。因此, 利弊大小难以判定。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存在一种既可以增加子女经济收入,

¹张仁汉.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才流失”问题探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²刘传初. 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才建设战略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又可以保证子女对父母的照料和陪伴时间的办法，那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同农村老年人缺乏照料问题一样，留守儿童问题也是随着农民大量外出务工而产生的。赵富才、李庆丰、朱科蓉、李春景、周淑琴等都持此观点。叶敬忠、段成荣、周宗奎则把留守儿童问题所产生的危害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殷世东、吴霓、迟希星等则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解决或是缓解的对策。不过已有文献的对策都是集中在如何教育留守儿童，或是如何促进留守儿童随迁。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让留守儿童这一现象彻底消失的好办法。

此外，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外出还会带来其他问题，如人才流失的问题。因为，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中必然有许多的农村较高素质人才。李小棒，柳玉民，张仁汉用数据证明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比全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状况明显高些。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不仅是农村中有年龄优势的那部分人，也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张仁汉还指出了人才的流失会带来的就是如村庄治理、农村基础教育缺乏人才的窘境。

综上所述，农村人口的收入、职业结构（非农收入、外出务工），与其性别比失衡、老年人口缺乏照料、留守儿童、人才流失等问题都是紧密联系的。

1.5 研究方法

1、资料获取方法

- (1) 访谈法，与行政村和自然村负责人进行交流，对该村村情有大概了解。并且在发放问卷中，对普通村民进行访问。并尽量进行纪要。
- (2) 问卷法，对需要数据量化的资料的搜集用到此方法。初步设想用此法对该村农户收入状况，人口状况进行数据搜集。
- (3) 文献法，阅读该村村志，到当地派出所获取该村人口年龄，地理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阅读其他研究者关于村域研究或者社区研究的文献资料。

2、资料分析技术

- (1) 统计分析。主要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设想在分析农户收入与其影响因素时，可用此模型。
- (2) 数据描述性分析。通过对数据的整理，简化，描述，直观的得出数据分析的结果。

1.6 研究思路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

引言部分，首先对本文的选题目的及意义进行阐述。同时对论文研究角度及研究对象的选择做出解释。并且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总结概括，评述其应当被本文吸收以及应当补充完善的部分。最后，给出可能会用到的研究方法。

论文的第一章将提出本文的核心问题。并且介绍本文选取 X 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对 X 村的基本情况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使读者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有一个直观的，大概的认识。为下文分析该村存在的问题做铺垫。

论文的第二章是对该村“空心化”情况及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参与方面存在的各种现象从人口结构的角度进行描述。对笔者在该村搜集到的一系列资料，包括问卷资料，访谈资料以及文献通过统计分析，以及描述性分析的方法进行处理。从而有理有据的指出该村农户收入偏低，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高，性别比不平衡，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和留守儿童缺乏照料，政治参与度低等问题。

论文的第三章是研究发现。这一章，将针对第二章提及的问题，阐述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机制。

论文的第四章是治理建议。通过第二、三章的分析，已经可以清楚的发现 X 村存在的各方面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之间的互相影响机制。有了这些条件，使得本章提出解决问题的治理建议水到渠成。

第2章 核心问题与案例选择

2.1 核心问题

村庄治理的关键在于人。

政治参与方面，人是村庄治理的主体，村干部，党员以及政治参与的全体村民。他们的素质决定了村庄治理的质量。

经济基础方面，人是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多寡，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庄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是村庄治理成功与否的一个基础评判标准。

社会结构方面，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人口结构的均衡与否是社会结构均衡与否的关键因素。一个性别结构，年龄结构严重失调的社会，其发生摩擦的概率更大。也就决定了这样的社会更难治理。

综上，人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庄的治理。

从以上因素角度分析，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村庄普遍保持着稳定的人口结构。但是，由于改革开放的施行，对农民入城限制的放宽，农民的人口流动开始活跃起来。这就好像一湖本来不起波澜的冬水突然被剧烈的搅动了一般，必然造成原本村庄稳定的人口结构发生急剧的变化。变化的趋势就是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的“空心化”。

就本文所调查的X村来看，存在着以下几种现象。经济基础方面，外出务工普遍，农民从事职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民收入比单纯务农增加很多，但依然较低。社会结构方面，存在着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老龄人口和留守儿童缺乏照料；政治参与方面，政治参与度低下，村庄治理人才流失。这些现象看似独立，其实是存在着很强的联系的。农民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开始进城务工，这虽然使得他们收入有所增加（受限于受教育程度，收入依然较低），但是也带来了老年人口缺乏照料，留守儿童，性别比失衡以及政治参与度低下和人才流失的问题。

本文的核心问题就是弄清楚X村这些现象之间的影响机制。针对上述现象的影响机制，思考是否存在办法，既可以保障X村农民非农就业，增加非农收入，又不至于产生

性别比失调及老人、儿童缺乏照料、人才流失的问题。

2.2 案例代表性分析

1956—1957 年，我国密集推出了一系列制止农村人口外流，进入城市的政策。1964 年，又出台了第一个人口迁移规定，严格控制城乡迁移。及至 1977 年，国务院首次明确“商品粮人口”和“农转非”概念。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正式形成¹。这一背景下，城市人口享受各种待遇（包括就业、住房、吃粮、医疗等各个方面），而农村人口除了种粮养活自己，不享受上述福利外，还要把剩余的粮食交给国家，养活城市人口。这种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就好像有一道大坝，坝的这头高峡平湖，坝的那头细水潺潺。

但是，从 1984 年起，我国逐步放宽了农民进城的限制。一边是较高的收入，一边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以想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必然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涌向大坝的另一边——城市。据统计，2013 年我国农村非农就业人数达到 1.8 亿，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外出务工的形式从事非农职业的。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²。这说明，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我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在此背景下，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的治理问题也在凸显出来。概括来说这个问题就是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后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村庄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参与等方方面面。再细化来看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人口性别比失衡，老年人口的照料，留守儿童，治理人才流失及政治参与度低等问题等。

据 2010 年数据，我国农村人口性别比达到了 117:100。农村初生婴儿性别比高达 119.13:100。其中，广东省 0—15 岁儿童性别比更是高达 137.76:100³。除性别比畸高之外，我国农村还普遍存在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达到 15.4%，比全国 13.26% 的平均水平高出 2.14 个百分点，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⁴。另外，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造成农村“空巢”⁵家庭或独居家庭的比例达到了

¹程贵铭.农村社会学[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85.

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³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⁴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⁵空巢家庭是指只有一对夫妇，没有子女一起居住的家庭。

44.2%。而这些家庭中的“留守”者多数已进入老年¹。还造成了全国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现象。据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到5800万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数量达到3000万人²。除此之外，这部分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中必然有许多的农村较高素质人才。外出务工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比全国农村人口受教育状况明显高些。这说明外出务工人员不仅是农村中有年龄优势的那部分人，也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³。人才的流失，对村庄治理，村民政治参与以及农村的基础教育等方面都是不小的打击。

本文所选取的案例——X村，是一个典型的劳动输出型村庄。也有着上述村庄普遍存在的特点问题。

一、人口的职业和收入结构

X村是典型的粤西村庄，十三个自然村间地理条件相差不大。用两分田，一分水，七分山来形容该村的地理条件是很恰当的。全村大约19000亩土地，其中耕地约3000亩。除去集体土地，人均分地0.5亩。土地肥沃程度一般，这可以从土地的投入与产出上看出。通过对村中200户农户的调查统计可以得出，平均一亩土地每年如果在投入化肥农药500元水平，则两季可以产出1500斤谷子。这样的生产水平在广东省内并不突出。

由上可知，X村的农户如果只靠种地的收入，可能只能勉强糊口。至于养殖业，也对X村农户的收入贡献颇少。因为，X村农户所谓的养殖业，不过是养几只鸡，好一些的家庭有几头猪，承包一个半亩到一亩多点的鱼塘。大规模的养殖户很少。对于这种小规模养殖户来说，他们的产品除了自己“消费”掉以外，卖出获得的收益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很小的。

不过，幸好该村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外出务工从事非农职业者很多。在该村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被抽样农户，户均人口4.7人，平均每户有2人从事非农职业，这说明该村农民非农就业比例很高，农户的非农收入是该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

二、人口的性别比失衡

全村性别比高达122:100，适婚年龄未婚人口性别比更是高达140:100。本文认为，

¹罗芳, 澄代彦.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空巢”家庭养老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6): 21-27.

²全国妇联.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I].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08. 2. 27.

³张慧芳.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才流失”问题探究[J]. 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 47-52 (58).

全村性别比畸高与初生婴儿性别比畸高不无关系。这是由于固有的重男轻女思想造成的。这种思想使村民“想方设法”生男孩。该村可能存在选择性堕胎现象。而适婚年龄未婚人口性别比畸高的原因主要是由女性人口迁徙造成的。这与该村劳动力输出型的职业结构有关（具体论述见下文 2.1）。

三、老年人口照料及留守儿童问题

全村人口 3776 人，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达到了 12.34%，比国际通常认为的 10%即可定义为年老型人口¹还多出了 2.34 个百分点。这说明该村已完成老龄化，进入年老型社会。并且，该村留守儿童比例很高，以该村中心小学为例，该校留守儿童比例达到六成。

老年人照料和留守儿童问题看似是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都是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的。这些青壮年劳动力或是子女，或是父母。

四、人才流失问题

该村存在人才流失的现象。该村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有 56 人，村委会干部中却只有一人达到高中学历。该村中心小学 14 名教师中也只有四人达到大专学历，没有本科学历者。

这一问题也是由该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决定的。因为，这部分外出务工劳动力中必然包含了人才。单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这些人才可能在城市里不算突出，甚至处于劣势。但是，对比其他农村人口，他们受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首先 X 村是一个典型的劳动输出型村庄。其次，该村存在着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人才流失等问题。

由此看来，在 X 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趋势不减的情况下，上述 X 村的各种问题的变化还会朝着加深的方向发展。

¹佟新. 人口社会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25.

第3章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的主要表现

“空心化”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人口的迁出。人口的迁出既是村庄“空心化”的产生原因，又是村庄“空心化”的具体表现。但是，村庄“空心化”并不能等同于农村人口的外流。空心化是一个复合的概念。它包括了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经济基础方面，农村人口的大量外迁造成了农村生产资源（包括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的大量流失，造成农村经济的萧条。社会结构方面，由于人口外迁造成的人口结构（如性别比失调，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和留守儿童缺乏照料等）的不均衡，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政治参与方面，人才的流失造成了村庄治理人才的匮乏，农民的大量外出，造成农村基层民主参与度的低下。不过，虽然村庄“空心化”造成的后果与表现形式十分复杂多样，但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农村和城市，第一产业与第二三产业间比较利益落差的巨大，造成的农村人口大量外迁。

因此，本章将从X村人口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角度作为切入点。对该村“空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分析。

X村辖有13个自然村，17支生产队。有的较大自然村有两到三支生产队，比如西坑村，宝岸村和旧村。总人口3776人，785户。其中男性人口2073人，女性人口1703人，劳动力资源¹2567人。

由表1可知，X村人口分布很不平均，比如人口最多的旧村可以达到700人以上，而人口最少的鲁村却只有50人。这与该村的地理环境是紧密相连的，和土地的平坦程度是成正比的。人口多的村落都是在地势较平坦的地方，而人口少的村落则是在地势相对不开阔的丘陵中。

X村农户主要以四口之家和五口之家居多。在对该村户籍的查阅过程中，发现，人口最多的户口有13人之多，当然这样的情况属于少数。人口最少的户口仅有一人，这

¹ 劳动力资源=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之外实际参加劳动人数-劳动年龄内不可能参加劳动人数。人口学定义劳动力为16至64岁的全部人口。但是，在本文考察的社区中，很多超过64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担负了很大一部分的农业劳动。并且，一些16岁以上的青年依然在校，很少或者没有参加劳动。因此，考虑到这一因素，为了对本文研究对象有较准确的表述，本文选用劳动力资源这一概念进行表述。

样仅有一人的户口却不少，全村有 65 个。而这种一人户口下的村民几乎全部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他们有的从未结婚，有的则是丧偶，或者离婚，子女也从户口上迁往了别处。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该村劳动力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这从劳动力资源占人口比重中可以看出。最低的子围，这一比例都可以达到 55% 以上，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四口之家，都有两个以上的劳动力资源。而这一比例最高的沙汶圹，达到了 75% 以上。其他村，普遍集中在 60% 到 70% 之间。

表 1：X 村详细人口分布情况

村名	生产队数(支)	户数(户)	男性人口(人)	女性人口(人)	劳动力资源(人)	总人数(人)	户均人口数(人)	户均劳动力资源(人)	劳动力资源占人口比
西坑	2	120	314	253	372	567	4.725	3.1	0.656085
宝岸	2	86	230	189	272	419	4.872093	3.162791	0.649165
旧村	3	142	379	328	495	707	4.978873	3.485915	0.700141
竹围	1	91	218	176	277	394	4.32967	3.043956	0.703046
子围	1	23	63	48	62	111	4.826087	2.695652	0.558559
水坑	1	77	214	168	266	382	4.961039	3.454545	0.696335
金围	1	53	128	99	162	227	4.283019	3.056604	0.713656
严村	1	46	119	120	163	239	5.195652	3.543478	0.682008
上波	1	23	65	57	76	122	5.304348	3.304348	0.622951
下波	1	46	144	103	163	247	5.369565	3.543478	0.659919
石头坑	1	33	82	63	100	145	4.393939	3.030303	0.689655
鲁村	1	11	23	27	34	50	4.545455	3.090909	0.68
沙汶圹	1	34	94	72	125	166	4.882353	3.676471	0.753012
总数	17	785	2073	1703	2567	3776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 X 村村委会

3.1 X 村的经济基础分析

X 村农户收入主要是由农地收入，养殖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国家补贴收入四项组成。从事职业主要分为两类，农业（种植业，养殖业）和非农就业（主要是外出务工）。

农户的四项收入之间是有联系的。因为劳动力资源的有限，投入其中一项的劳动力资源较多，那就意味着投入其他项的劳动力资源的必然减少。学界普遍认为，农民的兼业程度和其收入水平是成正比的。这是因为，农业部门的收益较低，而其他部门的收益相对较高。配第¹的比较利益理论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3.1.1 假设推论

上述论断是否符合本文所研究对象——X村的实际情况呢？通过对X村人口结构的观察，发现，该村虽然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是，这其中有一部分是64岁以上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存在受教育水平较低，体力衰退的客观实际。要想从事非农劳动是很难的。因此，他们普遍从事着农业劳动。在劳动力资源中，还存在着一部分妇女，她们有的受幼儿，老人牵绊，无暇外出务工。有的主观上不愿意外出。这两部分劳动力资源是X村从事农业劳动的主力军。在该村，由于耕地的稀缺，家庭所分得的土地是不多的。这些土地，靠这两部分人口种植是绰绰有余的。并且在X村，村民普遍聘请机械队翻地，收割来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以X村最普遍的五口之家来看，应分得土地2.5亩，家中只要有一个人务农就已经足够了。这样的家庭绝大多数都是有老人和务农的妇女的。这是不会对这个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量产生影响的。因为这两部分人口，即使不从事农业劳动，也不会使非农就业人口增加。因此，本文猜测，在X村，土地数量抑制农户收入增加的现象即使存在也是微乎其微的。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以及上述分析，本文设想，该村农户收入与家庭人口数量，劳动力资源数量，男性劳动力资源数量，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劳动力资源平均受教育水平，劳动力资源从事的职业，土地数量，种粮补贴等因素有关。做出上述设想原因如下：

- (1) 家庭人口越多，则可能劳动力资源就越多，自然农户总收入也就越多。
- (2) 劳动力资源越多，则可能农户总收入越多，这一影响应该是显著的。
- (3) 男性在生理上比女性能担负强度更大的工作，社会中也存在男性更容易就业的现象，因此，男性劳动力资源越多的家庭，可能收入越多。
- (4) 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越低，则可从事职业的选择范围也就越大，体能也越好，走出农村从事非农职业的意愿也就越强。所以，可能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越低，则

¹杨先明等. 劳动力市场运行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97。

农户收入越高。

- (5) 劳动力资源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则从事较高收入职业的机会也就越多。所以，劳动力资源平均受教育水平可能会对农户收入有较大影响。
- (6) 各个生产部门的收益率是不同的，因此，从事不同职业，对收入的影响应该是较显著的。
- (7) 土地数量和农业补贴的多少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为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是否会像其他学者所说的，产生负向的效果。有待实证证明。

3.1.2 实证研究

3.1.2.1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此部分所使用数据来源于对 X 村 200 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问卷样卷如附件。由于问卷发放的形式采取发放一份，调查人员从旁指导填写一份，审查一份，回收一份，再发放下一份的方式，因此，回收问卷质量很高。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问卷 200 份，其中有效问卷 200 份，有效问卷占总发放问卷数量 100%。覆盖人口 945 人，占 X 村总人口的 25%。发放密度上，每个自然村按人口数量发放相应数量的问卷。且在对该村早期的走访与问卷问题试问中发现，该村农户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因此，对总人口的 25% 进行问卷调查，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3.1.2.2 模型选择

大江洞农户收入主要是由农地收入，养殖业收入，非农就业收入，国家种粮补贴收入四项组成。本文预测影响这四项收入来源的因素有农户的家庭人口数量，劳动力资源数量，男性劳动力资源数量，劳动力资源年龄，劳动力资源受教育水平，所从事职业差异，农地数量以及种粮补贴数额等。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适合分析这些因素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选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解释这一问题。

构建农户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_i = \beta_0 + \beta_1 X_i + \mu \quad (1)$$

模型解释：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是用方程式的形式来表示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推断性统计模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适用于衡量具有连续性的因变量。本文中，农户收入这一变量，即为连续性因变量。

式中 Y 表示因变量， X 表示自变量， β 表示待估系数， μ 为表示随机误差项。

3.1.2.3 变量解释

表 2：变量及其含义

变量	变量名称
Y	农户收入（万元）
X_1	家庭人口总数（人）
X_2	劳动力资源数量（人）
X_3	男性劳动力资源数量（人）
X_4	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岁）
X_5	劳动力资源平均受教育水平（年）
X_6	参与种植业劳动力资源数量（人）
X_7	参与养殖业劳动力资源数量（人）
X_8	非农就业劳动力资源数量（人）

在调查中发现，农户家庭土地承包量，是由农户家庭人口总数决定的。而国家发放的种粮补贴数额又是由家庭土地承包量决定的（该村每亩土地种粮补贴为两季共 150 元）。因此，家庭土地承包量与家庭人口总数呈完全线性相关关系。种粮补贴数额也与家庭人口总数呈很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因此，在自变量中，保留家庭人口总数，删除了家庭土地承包量与种粮补贴额两个变量。

剩余的八个自变量的选取，主要是根据之前学者的已有研究，以及结合笔者所考察社区实际两方面做出的。其中 X_6, X_7, X_8 三个变量均为劳动力资源从事职业的观察项。考虑到受调查人无法准确的知道家中每个人的收入情况。并且有可能受到“不露财”思想的影响，不愿意透露家中从事各职业的劳动力资源的具体收入情况。因此，本文用参与不同职业的劳动力资源人数而不是直接用农地收入，养殖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来做自变量。这样可以排除上述造成不准确的因素。从而减少麻烦，增加准确性。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X1	4.725	2.090749	10	1
X2	3.225	1.814064	8	0
X3	1.625	1.019594	4	0
X4	41.28833	13.50351	66	0
X5	7.256875	2.708869	12	0
X6	1.075	0.7224852	3	0
X7	0.55	0.8372604	4	0
X8	2	1.287747	5	0
Y	4.911	4.083688	17.2	0.02

3.1.2.4 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运用 SPSS15.1 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 4: 各变量相关性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Y	相关性	.668**	.813**	.841**	.049	.350**	.094	.286**	.800**
	显著性. (2-tailed)	.000	.000	.000	.491	.000	.184	.000	.000
	N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注：*表示信度水平为 95%，**表示信度水平为 99%

由上表可知，自变量 X1, X2, X3, X5, X7, X8 对因变量 Y 相关性显著水平较高。自变量 X4, X6 对因变量 Y 相关性显著水平较低。因此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剔除变量 X4, X6。

表 5: 回归模式摘要

模式	R	R 平方	调整后 R 平方	估计标准误差	变更统计量					D-W值
					R 平方改变量	F 改变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显著性 F 改变	
1	.891 ^a	.794	.788	.46078473	.794	124.042	6	193	.000**	1.932

注：*表示信度水平为 95%，**表示信度水平为 99%

由上表可知，显著性 F 改变为 0.000，这说明该模型具有统计显著意义，模型总体显著性水平较高。调整后 R 平方为 0.788，这表明剔除 X4, X6 后的 6 个自变量一起可以解释农户收入总变异的 78.8%，拟合优度较好。D-W 值为 1.932，说明无自相关现象。由此可知，该模型具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

表 6：回归系数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值	标准误	Beta				容忍度	VIF
1 Y	9.248E-16	.033			.000	1.000		
X1	.010	.062		.010	.155	.877	.279	3.584
X2	-.049	.099		-.049	-.493	.623	.110	9.118
X3	.477	.065		.477	7.304	.000**	.250	4.001
X5	.019	.037		.019	.507	.613	.796	1.256
X7	.225	.044		.225	5.091	.000**	.548	1.825
X8	.444	.077		.444	5.736	.000**	.178	5.613

注：*表示信度水平为 95%，**表示信度水平为 99%。

从上表可知，VIF 值均小于 10，说明该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以上六个自变量中，X3, X7, X8，即男性劳动力资源数量，参与养殖业劳动力资源数量，非农就业劳动力资源数量三个因素对农户收入起到较大影响。

3. 1. 2. 5 结果分析

(1) 本文发现，家庭人口总数对农户收入影响不大。这与之前的预测不符。这与经验中的，家庭人口越多，则可能劳动力资源越多，则收入也就越多，至少不会是收入减少的逻辑向左。

不过，考虑到该村实际情况，这一疑惑也就解开了。可能是由于该村的土地分配方式是按照家庭人口数量分配的。也就是说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家庭土地也就越多。按照高新才，滕海峰¹ (2011) 所说的土地数量对农户收入起反向作用的逻辑。土地多的家庭的成员外出从事非农职业的积极性偏低。而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是比其他部门收益低的。所以，家庭人口越多，则农户收入越低。不过这一影响是不显著的。

¹高新才，滕海峰. 土地要素对农户就业行为及农户收入影响研究——基于甘肃省青城镇 344 家农户调查 [J]. 西北人口, 2011, 32(3):108-111, 116.

(2) 家庭劳动力资源数量对农户收入不具有显著影响。这与之前预测的家庭劳动力资源会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有一定的差距。这可能是因为，该村劳动力资源包含了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口，女性人口，文化较低人口。他们虽然也参与劳动，但是获得的收益较少。而该村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那些青壮年劳动力资源和非农就业劳动力资源。因此，劳动力资源总数的多少，并不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

(3) 男性劳动力资源数量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这与之前的预测完全相符。与高梦涛¹ (2005) 认为的男性劳动力过多会对农户收入产生负向影响相左。这一现象也很容易解释。在我国这样一个男权社会中，男性是家里的顶梁柱。在这方面。X 村作为普通的广东农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举个例子，笔者在严村发放问卷时发现，该村农户要不然大门紧闭，要不然家里只有年轻的媳妇或者老人和孩子在家，显得非常冷清。据村民说，村里的壮劳力一般都外出务工了。到过年的时候就热闹了。由此可见，男性劳动力资源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是主要的经济来源。

(4) 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对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这与之前的预测不符。按照之前的预测劳动力资源平均年龄越年轻的家庭，则收入越多。这可能是因为之前的预测忽略了较年长的劳动力资源，其技术水平，熟练程度，从事工作也可能更加高端，所以其收入也更高的原因存在。

(5) 劳动力资源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之前的预测认为劳动力资源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农户收入越高。这与之前的预测是不相符的。这可能是因为，首先，在该村初中教育水平及以下劳动力资源人数占总劳动力资源人数的 89.3% (见表 12)。这部分人，由于技术缺乏，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其他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收入普遍不高。因此，在收入差异上的表现是不明显的。

(6) 参与种植业劳动力资源数量对农户收入虽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并且这种影响是反向的。首先，影响不大，说明 X 村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种植业。这是很容易解释的。该村人均分地很少，只有 0.5 亩。并且，主要种植的是水稻，每家只用很小一块地来种植仅够自给自足的蔬菜。

按照我们的逻辑，应该是生产什么收益高，就生产什么。水稻和蔬菜对比，无疑是种植蔬菜收益更大。但是，村民却用相对大面积的土地种植水稻。村民解释说，首先，种蔬菜需要更多的精力打理。其次，土地面积不大，转种蔬菜也不能增收很多。如果自

¹高梦滔. 劳动力性别比例与农户长期收入：中国的经验证据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 (9) :24-32.

已不种水稻，那就要从市场买米。不如自己种自己吃，生产环节（如农药的使用）自己清楚，比较放心。最后，如果自己把蔬菜送往市场，则成本较大。而菜贩子，也更愿意去种菜户相对集中的地方或者向种植大户统一收购。如果村里只有零星农户种植蔬菜，那就很难卖出去。所以，“别人不种，我也不敢种”。村民给出的三点解释，说明该村农户种植出的产品，不论蔬菜还是水稻，大部分都是自家使用的。偶尔有了盈余才会去市场出售。而本文计算种植业收入的方法是出售部分才计入收入。所以，该村农户来自种植业的收入是很少的。因此，对农户收入影响不大。

其次，参与种植业劳动力资源数量对农户收入具有反向性。说明在 X 村也存在农户的农业生产抑制农户收入的情况。这是生产部门间比较利益差距造成的。其机制上文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一变量虽然对农户收入存在抑制作用，但不显著，这一结果符合猜测设想部分的预测。

（7）参与养殖业劳动力资源数量对农户收入影响较大，且这种影响是正向的。养殖业也是农业的一部分，可是却没有像种植业那样对农户收入产生抑制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首先，该村大部分农户所谓养殖业也只是一两个人饲养一两头猪，或者几十只鸡这样小规模的生产。即使是家里承包了鱼塘的农户，也没有投入太多的劳动力资源。因为，该村虽然鱼塘多，但是，都是很小的鱼塘，普遍一到三亩大小。这样的生产规模注定了不需要专职人员专门经营。参与养殖业的劳动力资源也都是一边种地，一边参与养殖。并且把养殖业当成副业来做，种地之余，有富余的精力才会参与养殖。这就是说，参与养殖业劳动力资源数量对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即使存在抑制作用是很小的。

虽然村中养殖业规模普遍较小，但是也有少数较大规模的鱼塘和养猪户，和养鸡户。这样的农户，劳动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养殖业，且这种大规模养殖收入较高。所以，在 SPSS 软件分析时，由于有上述个案存在，所以得出养殖业对农户收入具有较大影响的结果。但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普遍来看，养殖业还是对农户收入影响不大的。基于此猜测，本文尝试删除那些参与养殖业劳动力资源较多的农户样本。结果，确实得出了参与养殖业劳动力资源数量对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的结论。

（8）非农就业劳动力资源数对农户收入影响显著。且这一影响为正向的。这说明该村非农就业较为普遍。且该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就业。但是，收入水平较低。并且外出务工成本较高。彭恒军¹（2001）认为，外出务工成本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

¹彭恒军. 乡镇社会轮——农村工业化与新型工资劳动者研究[M]. 人民出版社, 2001:87.

是经济成本，另一方面是心理成本。经济成本包括交通费用，寻找工作的费用，居住费用以及更高的伙食费用。以 X 村普通的五口之家为例。如果这家有夫妻二人在肇庆市务工，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则路费每月需要 150 元，一年需要 1800 元。二人在外租房，就算住 300 元每月的房子，一年也要 3600 元。再加上二人在外的伙食费，最保守估计，两人一天一共 15 元，一年除去休假日回家也要 3900 元左右。仅这三项固定开支，一年就需要 9300 元。如果这二人，每天回家居住，那么路费一年需要 5220 元，加上中午在外吃饭，也大约需要 5000 元，总共需要 10220 元。也就是说，这户农户，外出务工的经济成本在 9300 到 10220 左右。这还是建立在他们住最便宜的房子，吃最低廉的伙食，没有其他支出的基础上算出的数字。并且他们还只是在肇庆务工，离家仅有 20 多公里，更别提那些远走异乡的打工者了。

3.2 X 村社会结构分析

村庄“空心化”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农村人口的大量外迁。这必然导致原有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人口的大量外迁，尤其是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迁，造成了村庄男女比例失调，老龄化严重，老年人口缺乏照料，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3.2.1 性别比的失调

上文已经简单的介绍了该村的人口基本情况。其中一个细节就是，该村男女人口数量非常不均衡。该村中人口 3776 人，其中男性人口 2073 人，女性人口 1703 人，相差 370 人，男女比例达到了 122: 100。这个数字包含了已婚人口。如果要探究未婚男女的成家形势问题，则需要看该村适婚年龄以上未婚人口的情况。在该村适婚年龄未婚人口上，这一比例之高更为令人惊讶。

表 7：X 村适婚年龄以上各年龄段未婚人口分布情况

	20-29 岁	30-39 岁	40-49 岁	50 岁及以上	总和
女性人数（人）	208	56	25	7	296
	22-31 岁	32-41 岁	42-51 岁	52 岁及以上	
男性人数（人）	278	84	29	25	416
比例（男：女）	134: 100	150: 100	116: 100	357: 100	140: 100

注：以上数据源于大湾镇派出所

通过对人口过程的了解可知，人口是通过出生死亡，或者迁入迁出来进入或者离开所研究社区的。X 村也不能例外，其现有性别比的形成，也一定和人口的出生，死亡，迁移三个因素有关。

首先，是否是由于生育的原因造成了这一人口现象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儿童比例上，就是失调的。这样的失调无非是由于选择性堕胎，弃婴，杀婴和生活水平提高从而降低非自愿流产率¹四种原因造成的。弃婴和杀婴属于刑事案件，通过对大湾镇派出所的寻访，并未发现此两种案件。那么是否有可能是选择性堕胎或生活水平提高造成的呢？这从该村新生儿比例上可以看出。

表 8：X 村 1984-2013 年新生儿性别分布情况

年份	男婴人 数(人)	女婴人 数(人)	比例(男:女)	年份	男婴人 数(人)	女婴人 数(人)	比例(男:女)
1984	32	33	97: 100	1999	36	17	212: 100
1985	24	34	71: 100	2000	34	17	200: 100
1986	33	30	110: 100	2001	30	17	176: 100
1987	29	24	121: 100	2002	21	20	105: 100
1988	28	44	64: 100	2003	27	18	150: 100
1989	37	35	104: 100	2004	29	22	132: 100
1990	39	43	91: 100	2005	19	31	61: 100
1991	31	30	103: 100	2006	32	27	119: 100
1992	48	35	137: 100	2007	25	28	89: 100
1993	32	31	103: 100	2008	35	18	194: 100
1994	28	36	78: 100	2009	35	19	184: 100
1995	45	28	160: 100	2010	34	24	142: 100
1996	29	32	91: 100	2011	32	15	213: 100
1997	44	31	142: 100	2012	27	23	117: 100
1998	30	14	214: 100	2013	17	10	170: 100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大湾镇派出所。

¹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37-238.

有资料表明，正常受孕性别比应该在 120-130，但是由于男胎流产率较高，所以在出生时，新生儿性别比应该在 110 以下。根据长期观察，全球普遍水平在 101-107 之间¹。通过对上表的观察可以看出，1995 年后，确实存在明显性别比增高的现象。这说明该村 1995 年后确实存在，由于生活水平提高，造成的非自愿流产率下降，或选择性堕胎人为控制性别的情况。而生活水平提高这一原因只能解释最高 130 的新生儿性别比。但是，由上表可见 1995 年后的年份中，性别比普遍高于 130，最高的 1998 年达到了 214。这不是巧合，因为为了降低数据偶然性，从总和上看也是如此。1995 年至 2013 年总共出生了 581 名男婴，411 名女婴，总性别比高达 141。那么如此畸高的性别比只能说明该村存在选择性堕胎的现象。虽然，该村近 20 年性别比如此之高，但是，依然无法解释为何该村适婚年龄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因为，在 2014 年，最年轻的适婚人口也是在 1994 年出生的。1995 年后的新生儿性别比对 2014 年适婚人口性别比还没有产生影响。

其次，是否是由于死亡的原因造成了这一人口现象呢？村中是否存在适婚年龄未婚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这样的现象呢？根据 Madigan²实验，男性死亡率应该高于女性。并且在对该村的实地探访中，并未发现这样的现象。在对派出所提供的该村人口数据中，也未发现其死亡率的异常。所以，该村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绝不是由于女性死亡率高的原因造成的。

最后，是否是由于人口迁移的原因造成了这一人口现象呢？如果是，那么就是说，该村存在着适婚年龄女性人口大量外迁的现象。在调查中，发现这一现象是存在的。本文通过对 X 村 2010 年至 2013 年四年的人口迁出情况的分析看出，该村女性人口确实存在着比男性人口更加活跃的外迁现象。详细情况见表 9。

表 9：X 村 2010 至 2013 年人口迁出情况

年份（年）	2010	2011	2012	2013	总数
总迁出人口数（人）	22	12	9	26	69
迁出女性人口数（人）	18	11	9	21	59
迁出男性人口数（人）	4	1	0	5	10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大湾镇派出所

¹佟新. 人口社会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37-238.

²佟新. 人口社会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09.

再由下图可知，X 村由于结婚原因迁出的女性占到总迁出女性的 63%，投靠原因迁出的女性占总迁出女性的 34%，而通过购买城市住房迁出的女性只占总迁出女性的 3%，工作原因迁出和迁回原籍的女性近四年都没有。这其中，所谓投靠原因迁出的绝大部分都是投靠了自己的配偶。从表 10 可知，大部分迁出的女性都是 20 到 39 岁的女性，他们的孩子尚小，父母依然居住在村中，因此，她们能够投靠的对象绝大部分都是配偶。所以，不论是结婚还是投靠原因引起的女性人口迁移都是由其婚姻决定的。婚姻在该村女性人口的迁移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图 1：X 村 2010 至 2013 年女性人口迁出原因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大湾镇派出所

表 10：X 村 2010 至 2013 年迁出女性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年份 (年)	2010	2011	2012	2013	总和 (人)
19 岁及以下人数 (人)	1	1	0	2	4
20-29 岁人 (人)	12	8	6	15	41
30-39 岁人 (人)	2	2	2	3	9
40-49 岁人 (人)	2	0	1	1	4
50 岁及以上人数 (人)	0	0	0	0	0
总和 (人)	18	11	9	21	59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大湾镇派出所

3.2.2 X 村人口年龄结构

为了对 X 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有全面的了解，我们不妨先看看下表。由下表可知，该村 14 岁及以下儿童 726 人，占比 19.2%。而 65 岁及以上老人 466 人，占比 12.34%。而占比最多是 15-24 年龄段（占比 17%）和 40-49 年龄段（占比 17.2%）。这两个年龄段之所以突出的多，与历史的生育高峰有关。

表 11: X 村人口年龄结构表

年龄段 (岁)	人数 (人)	占比 (%)
0-4	235	6.2
5-9	262	6.9
10-14	229	6.1
15-19	311	8.2
20-24	332	8.8
25-29	286	7.6
30-34	264	7.0
35-39	229	6.1
40-44	330	8.7
45-49	321	8.5
50-54	197	5.2
55-59	187	5.0
60-64	127	3.4
65-69	116	3.1
70-74	96	2.5
75-79	119	3.2
80-84	77	2
85 岁及以上	58	1.5
总和	3776	100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 X 村村委会

如果将上表数据做成条状图如下图，就可以很清晰的发现，X 村的人口年龄结构图，其实是呈半纺锤形的（由于研究不需要，该图没有加入性别条件，如果加入性别条件，该图应为近似纺锤形）。人口年龄结构呈半纺锤形，其实和纺锤形表达着相同的含义，即被考察对象的人口增长模式为负增长型¹。如此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增长方式对于该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¹ 佟新. 人口社会学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39-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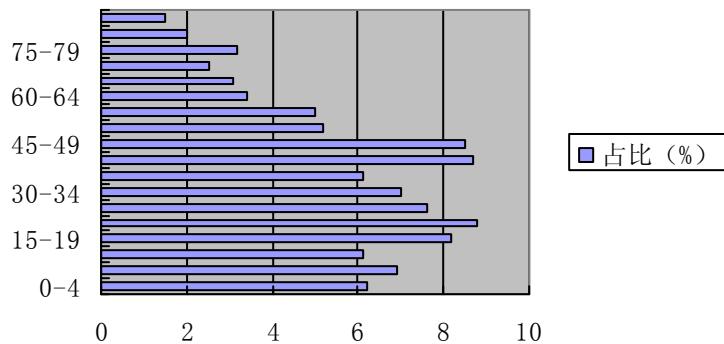


图 2: X 村人口年龄结构条状图

注: 上图数据来源于 X 村村委会

3. 2. 2. 1 X 村已进入年老型社会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寿命的增长，老年人口的定义也在不断变动。国际上通常认为 65 岁及以上人口可以定义为老年人口。老年人口超过社会总人口的 10% 即可定义为年老型人口¹。

在上文中，为了更好的说明农户收入的问题，引入了劳动力资源这一概念。在 X 村总人口 3776 人中劳动力资源有 2567 人，占比 67.98%。从这一数据中，似乎可以认为该村劳动力资源十分充足，不会由于老年人口造成太大的负担。其实不然，劳动力资源=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之外实际参加劳动人数-劳动年龄内不可能参加劳动人数。这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中包含了许多仍在劳动的老年人口。

由表 11 可知，X 村的已经步入年老型人口状态。其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达到了 12.34%，比国际通常认为的 10% 即可定义为年老型人口状态还多出了 2.34 个百分点。其次，国际通常认为老年人口可以分为两个部分，65 至 74 岁的老人是低龄老人，75 岁及以上的老人是高龄老人²。在该村 466 个老年人口中，高龄老人有 254 人，低龄老人有 212 人。且老年人口平均年龄达到了 75.77 岁，这说明该村老年人的年龄普遍较大。

之所以老年人口要分为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两类，是因为，65 至 74 岁的老人人口依然保持着较强的自理能力，有的甚至还参与生产。比如，X 村的田间地头就有很多老人的身影，他们有的甚至超过了 70 岁。而 75 岁及以上的老人自理能力明显比低龄老人差。高龄老人比低龄老人更需要照顾。一方面，X 村高龄老人比重大，另一方面，平均

¹ 佟新. 人口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25.

² 佟新. 人口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25.

年龄 75.77 岁，也超过了高龄老人的标准。由于死亡率的低下，以及该村的负人口增长模式，可以预计，在将来的几年，该村老年人口比重将会持续增加，并且会有更多的低龄老人加入高龄老人的行列，该村老年人口的平均年龄也会持续走高。

面对上述情况，该村的养老问题不容乐观。综合学者高建新，李树苗，左冬梅¹（2012），阳义南，詹玉平²（2003），胡豹，卫新³（2006）的观点，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从养老资源来源上看，主要是家庭养老和个人养老。由于我国传统的“孝”的文化对子女的影响，以及老人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老人和子女都不倾向于选择敬老院养老。不论是家庭养老还是个人养老方式，都是在家养老。这就要求子女对老人投入照料和时间。尤其对高龄老人，失能老人，这样的投入会更大。

发达国家已有研究发现，65 岁老龄人口的平均开支大约是 15—64 岁年龄层五倍⁴。虽然这是发达国家的数据，我国可能达不到五倍这么高的水平。但是，这至少可以说明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是对其他年龄段不小的负担。这种负担不单是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与陪伴上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青壮年人数不仅通过自然年龄增长的方式不断减少，还由于外出务工，造成实质上的无暇照顾老人。那么该村的老年人照料问题无疑将雪上加霜。遗憾的是，调查中发现这个“如果”正在该村发生。下一节将给出证明。

3.2.2.2 X 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

该村虽然处于人口负增长过程中，但是 16 岁及以下儿童的占比却也不少，达到 861 人，占该村总人口 22.8%⁵。这就为该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现象提供了基础。

对于留守儿童的概念，在讨论以下内容之前有必要先行界定清楚。首先，对于儿童的概念，存在分歧，有的认为 14 岁及以下可以称为儿童，有的认为 16 岁及以下可以称为儿童，还有的认为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可以称为儿童⁶。考虑到本文调查地的实际情况，本文觉得把 16 岁及以下人口称为儿童比较妥当。因为，如表 12 所示，X 村人口普遍（89.3%）接受完 9 年义务教育就不再上学了，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只有 10.7%。而 16 岁对于上学较晚的农村孩子来说恰好是初中毕业的年级。也就是他们中的

¹高建新，李树苗，左冬梅.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J]. 南方人口，2012(2):74-80.

²阳义南，詹玉平. 农村养老谁是主体[J]. 经济论坛, 2003(20): 4-5.

³胡豹，卫新. 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实践比较与启示[J]. 商业研究, 2006(7): 52-55.

⁴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30.

⁵数据来源于 X 村村委会

⁶赵富才.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2009.

大部分人不再上学的年级。其次，对于留守的概念也存在分歧。有的研究认为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家庭的儿童才算留守儿童，有的认为父母有一方外出务工即可算是留守儿童。本文认为赵富才¹（2006）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他认为父母双方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缺少了谁，都会造成缺位。因此，本文认为，父母双方有一方在外务工的儿童就可算是留守儿童。

表 12：X 村劳动力资源受教育水平分布情况

受教育水平 (年)	0 年	3 年	6 年	9 年	12 年	15 年及 以上
人数 (人)	8 人	580 人	423 人	1282 人	218 人	56 人
占比	0.30%	22.60%	16.50%	49.90%	8.50%	2.20%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 X 村委会

综上所述，本文界定的留守儿童概念为父母双方有一方在外务工，且 16 岁及以下的农村孩子，就是留守儿童。

由上文可知，留守儿童的构成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年龄要在 16 岁及以下。二是，其父母有一方在外务工。满足这两方面的 X 村留守儿童规模有多大呢？首先，上文已经介绍，X 村 16 岁及以下儿童人数为 861 人，规模很大。其次，要考虑该村人口外出务工的规模有多大。从问卷抽样数据来看被调查 200 户农户，平均每户有 2 人从事非农职业，而平均每户总人口为 4.725 人（见表 3）。不论从比例上还是规模上，都说明该村外出务工的规模是很大的。因此，可以推测，该村留守儿童的规模也将十分庞大。

为了证明以上推测，笔者简单探访了 X 村中心小学。从该小学负责人处了解到，该小学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该校留守儿童大约占到 6 成（由于没有做过专门统计，所以没有更加具体的数字）。他们的父母主要在肇庆市及珠三角其他城市务工。所以，不会像其他地区的留守儿童一样，很久见不到父母。

3.3 X 村的政治参与分析

X 村的村庄治理问题，其实就是人才的问题。

对村庄的治理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村庄治理的动力来源

¹赵富才.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2009.

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国家对村庄的扶持是外因，村庄自身如何把握政策，努力发展是内因。归根结底，实施治理手段的是人。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干部队伍，和参政群体才是实现村庄治理的可靠保障，是内因。可遗憾的是，随着该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外流，人才也一起外流了。

上文已经介绍，X村不缺少发展的优势（比如地缘优势，山地资源优势），可是却没有把这些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缺少“能人”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对X村的探访中，该村委会主任告诉我，村委会还欠他们工资。干完这届就不想干了。当我说这么多山地，不租给种桉树的，村里自己种果树，肯定收益很高时，他却显得兴趣不高。其实，我可以理解他兴趣不高的原因。种果树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活儿”。拿本地最适合种植的砂糖橘为例，三年开始结果，五年才进入丰产期，前三年只有投入。而三五年后，他可能早已不是村主任了。

表 13：X村村委会干部基本情况表

职务	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村委会副主任	村委委员（计生）	村委委员（账目）	村委委员
年龄（岁）	67	48	45	42	58	44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学历	小学	高中	初中	初中	小学	初中
是否会说普通话	不会	可以说一点点	可以说一点点	不会	不会	可以说一点点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X村村委会

再来看看X村村委会干部的基本情况。如表13，X村村委会干部的学历普遍偏低。达到高中学历的只有村委会主任一人。且党支部书记已经是67岁的老年人了。并且与该村委会的干部交流比较吃力，因为他们普遍不会说普通话。探访中，他们有时要重复几遍，我才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虽然农村干部的素质不光是以学历为标准，更不是以会不会说普通话为标准。但是，这两个方面，是该村干部素质的一个重要体现。显然他们的知识配备和交流能力是较低的。

笔者在X村探访期间，旁听了一次该村党支部会议，主要议题是换届选举筹备。该

村共用党员 134 名，到会 46 人。笔者对参会者年龄分布做了一个调查，情况如下：

表 14：X 村党支部会议参会者年龄情况表

年龄	60 岁以上	45-59 岁	30-45 岁	30 岁以下
人数	12	21	11	2
比例	26%	46%	24%	4%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 X 村党支部会议现场调查

由上表可见，X 村虽然党员人数有 134 名，但是实际到会人数只有 46 人。并且这 46 人中年龄普遍偏大。30 岁以下到会者只有两人。可以看出，该村政治参与群体老龄化严重。这并不是因为该村今年没有发展青壮年的党员。而是因为青壮年的党员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参与进来。

第4章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的原因及影响

上一章详细描述了X村经济、社会、政治参与等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些方面之间看似独立，但却紧密的互相联系。

探讨这一问题前，不妨先看一组该村1983年的人口数据。之所以参考1983年的数据，是因为，我国从1984年开始农村人口入城政策开始放宽，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流动。因此，考察1984年之前的数据，就是为了考察排除人口流动这一因素下，该村的人口结构状态。但是，很遗憾，由于年代久远，且当时文献记录有限，笔者只能找到该村当年的男女性人数，由推算出性别比，不过这于本文来说已经足够了。1983该村人口3128人，其中男性1653人，女性1475人，性别比为112¹。虽然此时X村性别比依然偏高，但是，作为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严重的典型粤西村庄，这个性别比是在正常范围内的。至于上文提到的老年人缺乏照料，留守儿童，人才流失问题，由于几乎没有青壮年外出务工，就更不可能存在了。

当然，通过这一组数据，就想把X村性别比失调及老年人照料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归因于该村人口职业、收入结构的变化，有些牵强。所以，下文将详细论证这几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4.1 X村经济基础对该村社会问题的影响

上文（第二章，第三节）已经说明，X村农户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职业。非农职业是X村青壮年职业结构的主要部分。而从事非农职业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外出务工。这就是该村的经济基础。而该村的主要社会问题包括人口性别比的失衡，老龄化严重，且老龄人口和留守儿童缺乏照料以及教育资源的短缺。

¹数据来源于X村村委会

4.1.1 X 村收入、职业结构与性别结构的关系

用雷文斯坦的人口推拉理论和人口迁移法则¹则是可以解释为何 X 村目前的性别比与 30 年前相比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人口推拉理论，可以判断，X 村作为相对贫穷的村庄，对人口的迁出是有一定推力的。而城市，对于 X 村的农民是有拉力的。所以，X 村的女性人口更愿意往富裕地区流动是可以解释的。其次，人口迁移法则认为女性在短距离迁移中具有优势。以上两点就是 X 村经过 30 年的人口宽松状态后性别比急剧升高现象背后的原理。人口流动是重要原因，而人口流动的又是由该村青壮年从事非农职业决定的。

可是，人口宽松政策并没有把男性排除在外，可能男性外出务工的比例还要更大。那么，为什么最后迁出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只有小部分的男性呢？这是由 X 村男女迁出途径的不同造成的。上文（第二章，第一节）已经说明了 X 村女性迁出主要是由其婚姻决定的。嫁出去，或者投靠丈夫。可是 X 村的男性却不是通过这条途径迁出的。首先，由于近年来的土地政策，农村人口，越发在乎自己的农村户口，因为农村户口背后可能代表着可观的利益（如征地补偿）。并且城市户口背后隐含的福利优势也在逐渐变少。其次，X 村的劳动力资源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见表 12），并且从事较低端职业。想在城市立足比较困难。

一方面，是女性人口流出相对容易，另一方面男性人口虽然外出务工，但没有真正 在城市立足。这就必然造成了 X 村适婚未婚年龄人口的性别比偏高的现象。X 村男性结婚难的问题也就自然生成了。

X 村的适婚年龄男性如果想结婚，不外乎两种途径，一，在本村找；二，去村外找。不过由上文已知，本村适婚年龄未婚女性本来就存在较大缺口。那么，多出来的这部分适婚男性就必须选择第二条道路—去村外找。可是，去村外找的形式也不容乐观。

首先，上文有过介绍，该村年轻劳动力资源外出务工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工地从事土木建设；二是在流水线从事机械的劳动（比如制衣厂）；三是有一定技术的技术工人（比如电焊，挖掘机）。男性劳动力资源主要是土木建设工人和技术工人。而从事流水线机械劳动的大部分是女性劳动力资源。从职业的分化上来说，造成了男女劳动力资源的分隔，这是不利于男性劳动力资源寻找配偶的。但是，这其中，技术工人由于

¹ 人口迁移法则认为，女性人口在近距离迁徙中比男性活跃。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4.

从事职业的不同，工作中接触女性的机会多少也有差别。比如，在制衣厂修理机器的工人工作中接触女性的机会就相对多，在工地开挖掘机的工人在工作中与女性接触的机会与从事土木建设的工人一样少。因此，在工作中，该村适婚年龄男性接触女性的机会总体来说是不多的。当然，不排除他们在业余生活中寻找配偶的可能性。

其次，在收入分析中已经说明，虽然非农就业收入在该村的农户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该村劳动力资源受教育水平较低，从事职业较低级，所以，收入较低。而收入的多少与女性的青睐程度是呈正比的。这种现象可能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能够打到更多猎物的男性，就能养育更多的子女，为配偶提供更多的物质。当然，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提及这一历史只是为了说明收入的多少与女性青睐程度之间的影响机制。并且，根据 Ravenstei 的人口推拉理论，女性人口更愿意从贫穷的地区嫁入富裕的地区。因此，收入较低，也是 X 村男性寻找配偶的一大障碍。走访中，遇到了这样一家农户，该农户家中有三口人，父亲去世了。家中剩下母亲和兄弟二人，兄弟二人分别 37 岁，40 岁，至今均未成家。在与老二的交谈中发现，家中母亲跟着哥哥过，地归哥哥和母亲种。他时不时出去打零工，属于有活就干，没活就闲着的状态。生活勉强糊口。他娶不到老婆的主要原因，就是贫穷。

一方面该村适婚年龄女性大量外迁，造成该村适婚年龄男性相对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工作性质接触女性机会较少。收入较低，造成该村适婚年龄男性从村外寻找配偶的难度增大。这两点造成的结果就是——“光棍”盛行！

这里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该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有可能还会趋于恶化。因为，通过对该村近十年的新生儿性别的观察，如表 8 所示，可以发现，该村近十年，尤其是 1995 年后的男性新生儿性别比之高令人乍舌。这一情况对该村未婚男性寻找配偶的影响将会出现在 2014 年后。研究表明，人工流产中，只要有 10% 的人做了具有 60% 效率的性别鉴定，就可以解释性别比达 110 的情况¹。如果这种趋势在该村流行开来，那么可以想象，男性新生儿的比例将会更高。10-20 年以后该村未婚男性想要寻找配偶将会更加困难。除非该村未婚男性能够大量的从村外寻找配偶。但是，十分悲剧的是，男性比例的提高并不是 X 村一村存在的问题。而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女性在受孕时，胎儿的男女比例可以达到 120-130: 100。但是由于男性胎儿更容易流产，所以，在出生时，这一比例可以稳定在 101-107: 100²。但是，由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学

¹ 李涌平. 胎儿性别鉴定的流引产对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影响 [J]. 人口研究, 1993(5): 21-25, 13.

² 佟新. 人口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238.

技术的进步，非自愿流产率正在大幅降低。这就意味着男性新生儿出生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并且，由于我国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选择性堕胎也并不是X村存在的问题。因此，该村未婚男青年大量从村外寻找配偶从而实现平衡的形式不容乐观，今后村外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除非该村奇迹般的经济发展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未婚女性嫁入。不过，目前这种奇迹般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发生的苗头。

综上所述，X村的青壮年人口的非农就业决定了其从业途径——外出务工，大量人口的外出务工又导致了该村适婚年龄未婚人口性别比的不协调。从而导致了该村“光棍盛行”的现象。

4.1.2 X村收入、职业结构与老年人照料问题及留守儿童问题的关系

由于老年人口照料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有很高的相似性。所以，这里先来讨论老年人照料问题，再举一反三得讨论留守儿童问题。

首先，上文（2.2.1）已经说明，X村已经完成人口老龄化，并且老年人口，尤其是高龄老人比重还在不断提升。这就造成了该村老年人口对照料的需求很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大。其次，上文（2.3）证明，非农收入是X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就决定了X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的现状。也就决定了青壮年无暇照料老人的现实。这使照料老人和“讨生活”变成了一对不小的矛盾。

这一矛盾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子女外出务工会大大降低他们照料父母的精力和时间，对于那些年迈多病的失能老人，影响很大。其次，子女长期外出务工，会使父母怅然若失，孤独感增加。最后，高建新，李树苗，左冬梅，Susan L. Ettner¹（1996）的研究表明子女的外出务工可能会造成子女间对照料老人的推诿，这不仅在生活上是对老年人照料的缺失；在心理上也是对老年人的再一次打击。

另一方面，在该村的收入分析部分，本文已经明确说明了外出务工收入是该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不外出务工，子女们经济上，又很难支撑赡养父母带来的开销，尤其是有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的家庭。比如，最不能缺少的医疗开销。虽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新农合”参保比例很高，达到100%（原题见附件一，问题12。下文提及问卷问题，原题均在附件一中，下文不再提示）。但是，医疗方面的开销还是令人倍

¹Susan L. Ettner. 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Elder Care[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6(1): 189-205.

感压力。有高龄老人的家庭在调查中并不少见，老年人的医疗开销是农户普遍头疼的问题。“那也没办法！”是谈到这一问题时，笔者听到最多的句子。这反映出来的是种无奈的情绪。这种情绪来源于“孝”的思想的压力，以及对收入偏低的不满。由此可见，外出务工可以增加子女的经济能力，有助于他们为父母提供更好的物质支持。这是外出务工对于养老问题的积极影响。

现在，再来看看留守儿童问题。其实老年人照料问题和留守儿童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处于青壮年的中间一代，赚钱养家与花时间照料家庭存在矛盾的问题。

赵富才¹（2009）从家庭生活，亲情，学习，心理，品行，安全等方面状况详细说明了缺乏父母关爱对留守儿童带来的不利影响。父母双方，或者其中一方的缺位都会对留守儿童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父母的关爱和教导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儿童对于父母的需求。矛盾的另一方面，和上文探讨老年人照料问题时一样，还是父母们为了“讨生活”无暇满足孩子对父母的需求。

这一矛盾也体现在利弊两个方面。一是父母外出务工在精神上没有办法满足孩子被关爱的需求。二是父母外出务工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好的物质支持。

那么，外出务工对于该村的养老问题和留守儿童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这里很难量化考证。但是，如果有一种办法，既可以使青壮年不必远走外乡从而满足照料家庭的需求，又可以从事非农产业从而增加收入，那一定是一个利大于弊的好办法。

4.1.3 X 村收入、职业结构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影响基础教育质量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将主要从师资，和生源两方面来探讨 X 村基础教育的问题。

上文已经明晰 X 村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型村庄，其青壮年劳动力的职业结构主要是通过外出务工实现的非农职业。这是由比较利益决定的。根据此理论，但凡劳动力客观上拥有在城市生存的能力，且在城市就业收益比在农村大，主观上又有外出务工的意愿。那么该劳动力就将流向城市。这对于教师来说，其实也不例外。

以 X 村中心小学为例，先来看看师资方面。在探访 X 村中心小学时，该校何姓校长诉苦道工资太低。以他自己小高职称，23 年教龄来算，每个月拿到手才 2450 元。其

¹赵富才.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2009.

他普通教师，教龄 10 年左右的普遍工资不到 2000。由于工资低，有些“门路”或者愿意改行的教师都走了。我问他，如果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拿到多少。何校长很无奈的说他们这里这几年都没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因为如果他们来了，由于教龄短，每月也只有 1400 元左右。再加上这里是农村，一般大学生都不愿意来的。该校 14 名教师，30 岁以下的只有两人，均为女性。并且该校教师全部为本村或者邻村人氏。年纪较大一些的，普通话都很难说清楚。大专学历的教师只有 4 人（没有本科的）。

再来看看该校的生源。该校共有学生 402 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本村。绝大多数孩子都会在这里从一年级一直读到六年级，少有转学的情况。上文介绍过，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在这些学生里有六成左右都是留守儿童。这必然对他们的学业产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王薇，刘佰桥¹（2009）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面对负性压力事件的承受能力差很多。赵富才²（2009）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显著差于非留守儿童。

综上所述，由于比较利益的原因，X 村劳动力资源大量外流。这对于该村的基础教育，不仅在师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留不住，引不进优秀教师）。也对生源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留守儿童问题，虽然这一影响难以量化。

4.2 X 村经济基础对该村政治参与的影响

村庄治理的主体有两个，一个是村干部以及党员，另一个是民主参与的村民。

由上文对该村党支部会议的观察可知，该村即使是党员的政治参与程度也是颇低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党员也大量的外出务工了。这造成的最直观的现象就是党支部的青黄不接。其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村庄精英政治参与者的流失，这对于该村的村庄治理，民主建设，是一个极大的消极因素。

除了干部，党员这类村庄治理精英外，村庄治理另一主体是村民。在基层民主制度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最基本单位是村民。而村民又普遍以家庭为单位，在上述民主活动中进行意愿的表达。这种情况下，家里有话事权的人就对上述民主活动拥有了绝对的影响力。首先，如上文分析，该村外出务工者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他们普遍在家是一家之主或者学历较高者，有较高的政治参与能力和对家庭决策

¹王薇，刘佰桥. 农村儿童生活压力事件及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0(2):210-211。

²赵富才.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 2009.

的影响力。其次，由于长期在外，他们对村中需要决策事物的情况的了解程度是值得怀疑的。最后，由于他们长期在外务工，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在村外，在城市，他们对村中事物的热情程度必然不高，从该村党支部会议的参与程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教育水平是评价政治参与者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实虽然该村村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但是，如表 12 所示，大专以上较高学历人才还是有一些的。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全都不是村干部，他们普遍在外务工。学有所成者，为何不为该村的村庄治理服务奉献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人才的流出也可以用雷文斯坦的人口推拉理论解释。首先来看看 X 村对这些人才的推力。一、收入低。上文有过介绍，作为村委会主任，一个月也才 800 元工资。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太低，对大学毕业生来说也不例外。二、公平机会少。影响农村干部的选举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家族势力，选前“买票”，论资排辈思维等等。比如，X 村的党支部书记姓黎和村委会主任姓冼，而这两个姓都是村里的大姓。刚毕业的大学生，即使有心为村里服务，想选上村干部，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其次，再来看看城市对他们的拉力。收入比较 X 村 800 元的工资必然高出许多，并且相对发达的城市，更加讲究现代规则，各种规则也更加规范，所以相对农村来说更加公平。作为理性思考并且有一定竞争力的个体，人才会选择哪里就业自然一目了然。

综上所述，X 村的村庄治理需要人才。仅从学历这一项指标上来看，该村学历较高者普遍流向了城市。究其原因可以用雷文斯坦的推拉理论来解释。由此可见，要想改变人才的职业与收入结构，要在增大村庄的“拉力”上想办法。

4.3 本章小结

通过上文的论述，本文认为 X 村村庄治理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经济基础方面，社会问题方面，政治参与方面。

首先，经济基础方面。该村劳动力人口大量外出务工，非农收入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不过他们普遍从事着技术含量较低，收入也较低的行业。且他们的外出务工成本高昂。

其次，社会问题方面。该村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与该村适婚年龄未婚人口性别比失调，老年人照料问题，留守儿童等问题之间的矛盾。

通过前两节的论述已经可以清楚的知道外出务工是 X 村适婚年龄未婚人口性别比失

调，老年人口和留守儿童缺乏照料以及人才流失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非农收入，又是该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不让 X 村农民外出务工，获得非农收入，那么他们的生存都将存在问题，更别提婚姻和良好的照顾老人孩子了。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既可以使该村性别比趋于平衡，又可以使该村青壮年有闲暇照料老人孩子，还可以从事非农产业以保证收入不减少呢？

并且，随着该村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人口负增长以及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务农人口将会越来越少。那么将来多出来的土地要如何处置才能使其既不牵绊过多的劳动力，又能产生可观的效益呢？

最后，政治参与方面。村庄治理的主体是党员，干部以及村民。他们的素质和政治参与程度决定了村庄治理的水平。遗憾的是这些村庄治理的主体，也随着劳动力输出的大潮一起流失到了城市，这对于村庄治理无疑是一个消极的影响。

如何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将是下章的重点。

第5章 劳动力输出型村庄“空心化”的治理建议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的发现X村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该村的人口老龄化、老龄人口和留守儿童缺乏照料、性别比失调、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及治理人才流失等。也阐述清楚了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这一章，就将针对X村的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机制，提出治理建议。

不过，由于我国乡村众多，像X村这样的行政村用不计其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并且由于地理，历史，经济等等原因，地区间的村落，甚至同一地区的村和村之间都存在着差异。因此，本文提出的这些治理建议肯定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5.1 承接劳动密集型企业

通过本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X村应该在“双转移”背景下承接劳动密集型企业。

“双转移”是指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粤北、粤东、粤西相对落后地区转移。另外，较高素质劳动力继续向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由于珠三角地区发达程度颇高，并且其人口密集程度还在不断增加。这就必然造成了地租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空间日益受到挤压，这时寻找廉价的土地要素成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当务之急。

作为劳动力输出型的X村，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引入这类企业。首先，这类企业能够留住，吸引女性劳动力资源，解决该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制衣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这种企业的建立，会使本村女性不必远走去城市务工，还可以吸引附近村镇的女性劳动力资源来本村务工。这在化解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上一定可以起到显著的效果。对该村未婚男性结婚的问题，应该也是一个重大利好。

其次，对于该村的养老问题、留守儿童问题，承接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类企业落户乡村既可以使子女、父母们不必远走外乡从而满足父母、子女被照料的需求，又可以从事非农产业从而增加收入。这适合于该村目前的人口结构。

再次，上文已经明晰，人才的流失，主要是由于城乡间各种差异，及产业间比较利益差异引起的。如果在该村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那么对于提升该村的人气与经济将会有很大帮助。经济的发展，必然能够更多的留住，吸引人才。这对于该村的村庄治理、基础教育等方面的人才需求都是有利无弊的。

再次，如费孝通¹（1948），周大鸣²（2006），彭恒军³（2001）等所说，乡镇企业可以提高该村劳动力资源非农就业率，提高农户收入。承接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起到上述乡镇企业同样的作用，有不会产生传统乡镇企业的一些弊端，比如生产和管理效率低下，信息滞后，产品不对路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能够带动的非农就业不仅仅在于自身吸收的劳动力资源。还有一个放大效应。劳动力密集型吸收劳动力资源众多，围绕这部分人口的服务产业将会是一块不小的利润来源。基于人的逐利性考虑，工厂附近的小饭店，小卖部，交通服务等等都会相继出现。对于一个人口三千多人的村庄，这些产业能够吸收的劳动力资源也是不容小看的。并且，由于离家较近的因素，如上文提到的那些虽然身处壮年，但不得不在家照顾老人小孩，以及那些主观上不愿意外出的妇女提供了一个非农就业的选择。这样，必然会提高该村的非农就业率。从而提高农户收入。

再次，如上文所说，该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外出成本是很高的。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在外的住房，交通，伙食成本。如果这部分劳动力资源能够在家门口的企业工作，可以大大降低这部分成本，也是一种农户收入增加的形式。

最后，由于该村大部分劳动力资源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学历要求低的特点适合这部分人的就业。

并且，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行性很高。首先，X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可以解决如今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其次，高要市企业类型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珠三角城市，产业转移的压力很大。比如，肇庆市和高要市之间目前在建西江三桥，将来高要市更加便利的交通环境，必然带来地租的上涨。那么，作为利润单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哪里转移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X村虽然在高要市边缘地带，但是，距高要城区也仅有20公里，且有一条可以行驶货车的过境公路。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这里转移只会带来更低的成本。

¹费孝通. 乡土重建[M]. 岳麓书社. 2012: 94-108.

²彭恒军. 乡镇社会轮——农村工业化与新型工资劳动者研究[M]. 人民出版社, 2001:35-38.

³周大鸣. 凤凰村的变迁[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307-310.

5.2 发展土地入股

在上文的已有研究中可以推测出这样一种趋势，随着该村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多，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以及人口的负增长。务农人口将会越来越少。虽然该村现在还没有土地撂荒的情况出现，但是这种苗头已经出现了。笔者在走访时，遇到这样一家农户。从其新盖的房子和室内装修可以看出该农户应该算是殷实。几个孩子全部在外打工，家里只有老两口。由于吃喝不愁，他们只是平时打理一下自己院子里的菜地。家里分得的田地全都由亲戚在种。当我问及每年收多少租金时，老人家只是憨厚的笑笑说，“种粮食本来就不挣钱，收租金就没人要种了。谁想种就给谁种吧。村里都是亲戚朋友，也不能收钱。我们自己也没精力种，地不要荒着就行了。”其实像这样的农户出现，不是偶然现象。可以预计随着该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高，非农就业比例增大，这样的农户还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当地农民的心理也较为复杂。他们徘徊于“恋农”与“弃农”¹的情结之间。当问及问题 8“何种条件下，您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43%的受访者选择了“不论怎样都不愿放弃”。当问及问题 9“您是否在乎被出租的土地被如何使用？”，89%的受访者选择“在乎”。大部分受访者理由都是怕租用者破坏地貌。比如挖鱼塘，去田埂等。当问及问题 10“您是否在乎被放弃承包权的土地被如何使用？”，依然有 66%的受访者选择“在乎”。这其中，一部分受访者是因为“自己家的地，有感情”，另一部分是因为害怕新的土地使用者改变土地用途，比如建工厂，破坏附近的生活环境。通过这几个问题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受访者存在明显“恋农”的情绪。即使没有“恋农”情绪的受访者，也存在着对土地使用情况的关注与担忧。

可是与之矛盾的“弃农”情绪在受访者中也有很大的市场。当问及问题 6“如果有其他工作可做，且收益与务农相当，您是否还愿意务农？”（为了排除收入因素的影响，本题特别强调了“收益与务农相当”），82%的受访者选择了“不愿意”。选择“愿意”的受访者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年龄较大，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再往外跑的老年人。当问及问题 11，“您认为是否有必要让家庭成员参加非农技能培训？”，97%的受访者选择了“必要”或者“免费就愿意”。这说明，受访者渴望掌握技能，从事非农职业。也愿意让家人从事非农职业。由问题 6、11 可以看出，受访者也存在着明显的弃农情绪。

¹罗必良.农地保障和退出条件下的制度变革：福利功能让渡财产功能[J].改革, 2013 (01) : 66-75.

并且从问卷的第 7 题，“不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您愿意以何种方式流转您的土地？”的结果可以看出，23%的受访者选择“单纯租金”，44%的受访者选择“以土地入股”，还有 33%的受访者选择“都可以”。这说明该村农户对土地入股并无抵触心理。如果在该村铺开土地入股，应该是相当顺利的。

总结问卷的结果，受访者一方面不愿意耕种土地，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对土地的权利。这样的心理结合上该村的实际情况（年老型社会，非农就业比例高），本文发现，土地入股是最合适该村农户的模式。首先，农民保留了对土地的承包权。其次，这种方式迎合了农户非农就业及“弃农”心态。最后，由于土地由企业统一种植。企业讲求技术，把握市场的能力，必然提高土地的收益，给入股农户带来可观收入。

并且，土地入股的形式也适用于该村掌握在村委会手中的山地。如果施行，不仅可以增加农户和村里的收入，还可以对山地的水土保护带来正面影响。在本文看来，X 村的水土问题，本就不应该成为问题。

X 村山地面积广大，但是遍植桉树。这种树的弊端已在第一章中简单介绍。由于，当地山地普遍土质松脆，极易引发塌方和泥石流。这种土质上，种植保持水土的植物尤恐不及，该村却还在种植桉树这种破坏水土的植物。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由于桉树几乎不用打理，且该村山地几乎全部租给为造纸厂提供原料的经营者经营。对于村里来说，只要每年收取租金即可，不必劳力操心。可是，这样粗放式经营的收益也很低。上文已有计算，大约该村村民每人每年可以从山地出租中获得分红 300 元。这种方式，收益不多，破坏很大，得不偿失。

如果换一种方法，也许可以获得几十倍的收益。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土地的稀缺性。比如砂糖橘、皇帝柑等水果的主要产地就在肇庆，并且这些水果的产地范围不大，只有广东肇庆一带和广西少数地方。这就是这类水果价格较贵的主要原因。如果以村里的名义成立公司，再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引进合作者投入资金，在山地上种植果树，相信是可以成功的。

首先，以土地入股，不需要该村投入资金，适合该村的实际情况。X 村算不上富裕，如果要该村自己拿出资金来发展，是比较困难的。在与该村村委会主任交谈中了解到，村委会还欠了他们工作人员 3 个月的工资。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 800 元。由此可见，该村经济条件确实不佳。

其次，可行性高。这种合作方式门槛较低。正如坐落在该村的福加德绿色农业公司的负责人所说，现在公司缺的就是土地，而每年大部分的支出是在租用土地上。如果，

村里愿意以土地入股，合作成立企业，一方面可以减轻他们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可以降低风险。至于和村里共同分享经营利益，他很乐意。

最后，再来看看收益。以当地最适合种植的砂糖橘为例。一株可产 100-150 斤，每亩山地可种植 80 株，亩产可达 8000-12000 斤。如果以 2013 年的砂糖橘下树收购价 4 元计算，每亩每年产出可达 32000-48000 元。由于砂糖橘要到种植后的第三年才能结果，前三年化肥农药，树苗，人工（上一定规模后）费用每亩投入总和约 4000 元，三年后每亩每年投入约 1000 元。也就是说，第一年收获就能获利 28000-44000 元每亩。第二年由于投入的降低，收入可达 31000-47000 元每亩。五年后砂糖橘进入盛产期，这一数字将会更高。

最重要的是，果树不像桉树那样贪婪的吸收地力，破坏水土，抑制“土著”植物的生长。也不会像桉树那样，经常被砍伐，露出光秃秃的地表。因此，只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路径，合适的合作者，水土问题，本就应该在发展经济中被解决。本就不应该让其成为问题。

综上所述，土地入股的模式不仅适合于农户各家各户承包的土地，也适合于该村掌握在村委会手里的山地。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解决农民大量非农就业以及人后老龄化后的务农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给农户带来收益，另一方面可以维持山地的水土。当然，这种模式在该村能否实施，并且成功还要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村里决策的睿智，以及有责任感企业的参与。

5.3 政府的作用

5.3.1 政策支持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效率。简单说来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就本文来看，上文提到的承接“双转移”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发展土地入股的对策，没有政策的支持是做不到的。

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需要土地要素的投入。如 X 村 19000 多亩土地，其中经营建设性用地仅 1800 多亩，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宅基地，真正可用于经营的用地仅有不足 600 亩。作为耕地面积仅 3000 多亩的多山村庄，这一土地数量已不算少。但是，若想承接一两个劳动密集型企业就已嫌太小了，更何况大规模的引进呢。

耕地是有土地红线的，不能动。那么是否可以在山地上打主意呢？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山地要想变更使用用途，必须先收归国家，再出售，变为建设用地。这无疑增加了交易费用，也给某些寻租者提供了便利。如果国家可以允许行政村将一定比例山地由行政村自主决定用途。那么对于需要产业转移的企业和需要承接此类企业的村庄来说都是一个利好。这一方面增加了这类多山村庄的可支配用地，增加其收入。另一方面降低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用地成本。

其次，政府是否可以在税收减免方面，给予这些迁入村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优惠呢？从而鼓励这类企业进入乡村。另外，企业进驻基础设施落后的村庄，为了自身发展，可能会兴修基础设施，政府是否应该给予这些兴修基础设施的企业以补贴呢？因为企业的这些行为都有很强的正外部性¹。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再如，上文提到的土地入股的建议。如果没有政策的支持也是很难办到的。引用科斯定理²来说，政策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确定土地所有权和如何降低土地交易费用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政策是支持减少土地交易费用的。从土地信托，土地招拍挂，建立土地交易所等政策可以看出这一点。降低土地的交易费用可以提高土地要素的分配效率。不过，除了交易费用要降低外，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才是更深层次应该讨论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土地政策是包产到户，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农户只有承包权。因此，农户利用土地要素入股时，实际上只是转移了自己土地的使用权。这并不能保证承包权稳定，也就不能保证土地上的不动产的稳定。因此，作为企业在这类土地上投入沉没资本时，是有所顾虑的。所谓“有恒产，才有恒心。”这样的土地权利构成，不利于企业对土地投入。所以，目前来看，企业和农户直接签订土地租赁或者入股合同的情况很少。大多数，都是企业与村集体签订合同，租赁或入股集体土地。这不利于农户手上土地的盘活。这一问题涉及到的法律，政治因素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上述例子可以证明政府的政策对于此问题的重要性即可。

5.3.2 提高公共物品供给水平

政府在农村地区提供的公共物品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医疗卫生，基础教

¹存在正外部性时，物品的社会价值大于私人价值。

²科斯定理：当交易费用为零时，不论产权如何分配，最后市场都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反之，现实中交易费用不为零，所以，产权的分配对于市场是否到达效率至关重要。

育等。

基础设施方面。比如 X 村只有一路班车通往镇上、高要市和肇庆市，这路班车线路总共 24 公里左右，通往肇庆火车站，收费 7 元，远高于肇庆市公交车的票价。肇庆市内普遍公交票价在 1.5 元，较远的线路采用分段收费的办法，如 K02 路公交全长近 40 公里，全程收费却只有 6 元。由此对比可见，X 村的这路公交车确实太贵了。贵的原因在于这路公交车是承包给私人经营的，而私人总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城市中公交的运营费用一部分来自于票款，不足部分来源于财政补贴。这就相当于是对城市人口的一种补贴，是一种福利。城市人口较农村人口更加富裕，却可以享受到更加便宜的公共物品。而农村人口收入相对较少，却要负担更重的生活成本，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村庄要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在村庄里的生活成本高，那么村庄能够吸引到的人才就会更少，这不利于村庄的长远发展。

医疗卫生方面。X 村有 3776 人口，却没有一个卫生所。笔者在福加德绿色农业公司（农场）探訪时，遇到一位市区来此钓鱼的游客，被鱼钩刮伤了手，跑到十二公里外的镇上，才找到诊所。医疗设施的缺乏，对于当地产业的发展是很不利的。根据推拉定理，人才更趋向于去生存条件较好的地方生活。

基础教育方面。基础教育是重要的公共物品。教育有助于增加农户收入。该村劳动力资源普遍从事收入较低的职业，从事这样的职业是由劳动力资源自身受教育水平决定的。在上文的论述中，已经得出了该村劳动力资源平均受教育水平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该村劳动力资源中，受教育水平在 9 年以下者占到了劳动力资源总数的 89.3%。然而初中及以下教育是缺乏专业性的。这就造成了该村大部分劳动力资源缺乏一技之长的尴尬局面。从而造成了该村农户收入偏低的现状。这一现状只能靠教育来改变。

教育有助于减轻重男轻女思想，减少选择性堕胎，促进性别比平衡。再回到该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该村 1995 年后，选择性堕胎行为变得明显。如果照此趋势发展，该村的性别比例失调将会更加严重。客观上，国家一直明令禁止非医学目的胎儿性别鉴定。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屡禁不止。当然，这有违法成本太低，监管存在漏洞的原因。但是，更大的是主观原因，是千百年来，男尊女卑，重男轻女思想的外在表现。要从根本上杜绝选择性堕胎的问题，就必须改变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要改变这种观念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因为在小农经济中，男丁就是生产力。另一方面，改变这种观念要靠教育。不可否认，要改变人们的观念是很难的，尤其像这种根深蒂固的生育观念，需要

很长的时间来改变。改变生育观念的重要途径就是教育。联合国调查的重男轻女指数表明，同样文化条件下，发达国家的重男轻女指数低于发展中国家¹。这不仅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更好，也是因为发达国家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

不过，发展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资金与时间。一方面，要提高非农就业率。“温饱而知礼节”，农户富裕了，自然会更愿意把资源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中。通过乡村经济的发展，村庄有了活力，优秀的教育资源自然也更愿意进入村庄。

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靠政府的支持。并且，政府的支持才是重点。目前，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教育均等，机会均等的重要性，大力提倡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也提出了农村教师收入增长计划。由于基础教育是公共物品这一特点，决定了政府在教育提供中必须扮演主导和主要承担者的角色。

¹转引自佟新. 人口社会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47.

总 结

经过对 X 村的实地调查，发现了 X 村作为劳动力输出型村庄，有着很强的“空心化”的趋势。这从该村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参与等方面分析得出。并且这三个方面之间都是存在着很强的联系的。比如，该村劳动力资源大量外出务工，但是普遍收入较低，这也成为该村女性外流，男女比例失调的重要原因。再比如，年轻人的大量外出，势必给这个已然完成老龄化，并且高龄老人比例不断增加的村庄造成老年人口缺乏照料与陪伴的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结合统筹兼顾的思想对该村提出了承接“双转移”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土地入股，政府加大政策和公共物品投入的治理建议。正如上文所说，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个性。国家层面的政策是根据大部分村庄的共性提出的。对每个村庄的个性问题自然不能面面俱到的周全。这就需要每个村庄结合自己的实际，制定适合自己的治理策略。当然，这样策略的制定应当慎重，必须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因为这关乎几千人的福祉。通过科学的理论，结合村庄经济，人口，环境等方方面面情况制定的治理策略是较为科学的。如果条件允许，每个村庄都应该制定出自己的治理规划。在规划的制定上，研究者应该把智力优势与村庄实际相结合。这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兴趣，责任感，也需要国家的支持。当然，最关键的是有了好的发展策略，还需要有执行力的人来付诸实践。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才是一切的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

在这篇论文中，受主题和篇幅的限制，很多该村存在的其他“有意思”的现象无法深入研究比如，第三章中提到的掌握在村委会手中的土地不应该给造纸厂种植桉树，而应该以土地入股形式发展果林。桉树对水土的破坏，果林的经济效益相信村里不会不清楚。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每人去涉足呢？是村干部水平不够想不到，或者懒得干；还是同桉树种植者存在利益输送的关系呢？这可能会涉及到农村干部任用制度，农村基层治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

参考文献

中文文献

- [1] 佟新. 人口社会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2] 费孝通. 乡土重建[M]. 岳麓书社. 2012.
- [3]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
- [4] 周大鸣. 凤凰村的变迁[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5] 杨先明等. 劳动力市场运行研究[M], 商务印书馆, 1999.
- [6] 彭薇, 王旭东. 多学科视野下的社会保障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 [7] 陈达. 人口问题[M]. 商务印书馆. 1934.
- [8] 彭恒军. 乡镇社会轮——农村工业化与新型工资劳动者研究[M]. 人民出版社, 2001.
- [9] 李莹莹. 城市失能老人社区照顾的研究——以莱芜市莱城区M街道为例[D]. 山东大学, 2013.
- [10] 陈吉庆. 一种值得注意的人口移动形式——人口的钟摆移动[J]. 人口与经济, 1988 (3) : 19-21.
- [11] 陆学艺. 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J]. 社会学研究, 1989 (6) : 1-14.
- [12]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办公室. 对农民职业划分的调查[J]. 中国农村, 1994 (3) : 33-38.
- [13] 冉志, 郑万军. 我国农民职业分化探析[J]. 江南大学学报, 2006, 5(1) : 42-45.
- [14] 温莲香. 农民阶层分化与“三农”问题的思考及对策[J]. 理论与现代化, 2006(1) : 45-51.
- [15] 李雪, 穆利军. 社会学视角下农民职业分化的功能分析——以安徽省六安市花园村为例[J]. 传承, 2008(5) : 122-123.
- [16] 周世强. 农民分化对城乡二元结构变迁趋势的影响[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 27(2) : 1-2, 5.
- [17] 陈会英, 周衍平. 分化. 动因. 对策——中国农民职业分化问题探析[J]. 农业现代化研究, 1996, 17(5) : 258-262.
- [18] 姜海燕、李英忠. 关于小三家子村农民职业分化的调查与思考[J]. 黑河学刊, 1995 (2-3) : 26-28.

- [19] 王凤.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决定因素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学家, 2005(5):66-71.
- [20] 张改清. 农户投资对其经济收入增长的作用研究[D]. 浙江大学, 2004.
- [21] 李实.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2):16-32.
- [22] 宋莉莉.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及差异研究[D].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1.
- [23] 洪自同.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研究[D]. 福建农林大学, 2012.
- [24] 高新才, 滕海峰. 土地要素对农户就业行为及农户收入影响研究——基于甘肃省青城镇 344 家农户调查[J]. 西北人口, 2011, 32(3):108-111, 116.
- [25] 时红艳. 外出务工对农户收入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陕西省安康市 3 县 1106 个农户的调查与分析[J]. 学术论坛, 2011(4):158-163.
- [26] 高梦滔. 劳动力性别比例与农户长期收入: 中国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9):24-32
- [27] 董春玉, 刘颖.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析——来自安徽省天长市的实证检验[J]. 南方农村, 2013(8):29-33, 43.
- [28] 余建斌, 韩瑞宏. 种粮补贴政策对广东省农户种粮收益的作用效果与政策建议[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0, 31(4):429-433.
- [29] 罗峰, 黄丽. 发达地区种粮补贴政策体系及其效应分析——基于广东省的实证分析[J]. 南方农村, 2012(6):58-61, 78.
- [30] 蔡昉, 都阳. 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J]. 中国人口科学, 2002(4):1-7.
- [31] 盛来运.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07(3):2-15.
- [32] 樊新生, 李小建. 欠发达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8(3):16-23.
- [33] 高梦滔, 姚洋. 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 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 2006(12):71-80.
- [34] 李涌平. 胎儿性别鉴定的流引产对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影响[J]. 人口研究, 1993(5):21-25, 13.
- [35] 刘娟, 黄慧玲. 人口迁移与性别比关系研究评述.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1, 27(2):46-49.
- [36] 韩昱, 郑启五. 台湾地区人口省内迁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当代经理人, 2006(2):4-5.

- [37] 张善余, 俞路, 彭际作. 当代中国女性人口迁移的发展及其结构特征[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5, 11(2):13-19.
- [38] 马戎, 马雪峰. 西部六城市流动人口调查综合报告[J]. 西北民族研究, 2007(3): 135-175.
- [39] 高建新, 李树苗, 左冬梅.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J]. 南方人口, 2012(2):74-80.
- [40] 阳义南, 詹玉平. 农村养老谁是主体[J]. 经济论坛, 2003(20):4-5.
- [41] 胡豹, 卫新. 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实践比较与启示[J]. 商业研究, 2006(7): 52-55.
- [42] 王静, 吴明. 北京市某城区居家失能老年人长期护理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全科医学, 2008(12):2157-2160.
- [43] 朱微微, 郭岩. 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 中国护理管理, 2012 (12):57-59.
- [44] 闵瑰, 胡晓莹. 南昌市某社区老年人长期护理需求的调查[J]. 护理学杂志, 2010 (20): 85-87.
- [45] 罗芳, 彭代彦. 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空巢”家庭养老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6):21-27.
- [46] 马戎. 小城镇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J]. 中国社会科学, 1990(4):131-146.
- [47] 罗必良. 农地保障和退出条件下的制度变革: 福利功能让渡财产功能[J]. 改革, 2013 (01) : 66-75.

外文文献

- [1] Zhuo Adam Chen @ Wallace E. Huffman, Scott Rozelle. Migration And Local Off-Farm Working In Rural China[Z]. America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Danver:2004.
- [2] Li. H. Z&Zahniser. S. The determinants of temporary 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hina[J]. urban studies, 2002(12):2219-2235.
- [3] Susan L. Ettner. 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Elder Care[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6(1):189-205.
- [4] Lee. Y. , W. Parish, R. Willis. Son, Daughter, and Intergeneration Support in Taiwa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4(4):1010-1041.

[5] John R. Weeks. Popul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Concepts and Issues [M].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6:258.

[6] Marcia Guttentag & Paul Second. Too Many Women? The Sex Ratio Question [M]. SAGE: 1983:34.

[7] Zhao, Y. H.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Rural-to-urba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2) :281-286.

附件

村情调查问卷

您好！

为了了解贵村农民收入，人口，土地状况，制定合适的村庄治理政策，我们正在展开“村情状况”的问卷调查。希望您能给我们准确、真实、完整的信息资料。您的配合与支持对我们的科研工作非常重要。本问卷采取不记名的方式，我们将按照国家《统计法》的规定，对您提供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

谢谢您的支持！

1、家庭人口状况统计：

您的家庭人口 ，其中劳动力资源数 （16岁及以上，参加劳动的人员，在校学生除外），参与种植业劳动力资源数 ，参与养殖业劳动力资源数 ，非农就业劳动力资源数 （包括外出务工人员）。

家庭人口年龄学历情况：

成员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龄										
学历										

A、小学（6年） B、初中（9年） C、高中，技校，中专（12年）

D、大专，本科（15-17年） E、硕士研究生及以上（17年及以上）

2、土地状况统计：

您家承包耕地数量 亩，其中出租数量 亩，出租价格 元/亩。

您家承包山地数量 亩，其中出租数量 亩，出租价格 元/亩。

您认为您家土地的肥沃程度 （从1到5打分，1分最贫瘠，5分最肥沃）。

3、收入统计：

农地收入 ，
养殖业收入 ，
国家补贴收入 ，
非农收入 (外出务工收入)。

4、支出统计：

农地支出 ，
衣食住行支出 ，
交际往来支出 ，
教育培训支出 ，
医疗保健支出 。

5、您认为每亩土地补偿多少钱您愿意退出土地承包权？ (参考：以每亩土地每年收益 900 元计算，15 年一亩土地总收益为 13500 元)

6、如果有其他工作可做，且收益与务农相当，您是否还愿意务农？()

A、愿意 B、不愿意

7、在不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您愿意以何种方式流转您的土地？()

A、单纯租金 B、以土地入股 C、都可以

8、何种条件下，您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

A、合适的补偿款 B、提供城市住房 C、为家庭成员提供工作 D、为家庭成员转为城镇户口并缴交社保 E、不论怎样都不愿放弃

9、您是否在乎被出租的土地被如何使用？()

A、在乎 B、不在乎

10、您是否还在乎被放弃承包权的土地被如何使用？()

A、在乎 B、不在乎

11、您认为是否有必要让家庭成员参加非农技能培训？（ ）

- A、必要
- B、不必要
- C、免费就愿意

12、您是否参加了以下保险？（ ）（多选）

- A、新农合医疗保险
- B、新型农村养老保险

再次感谢您的大力支持，祝您身体健康，新年愉快！

问卷说明

总体来说，这份问卷的设计还是成功的。因为问卷中的大部分问题都是有意义的。写作中，我需要问卷给出的数据也总是可以在问卷中找到。这说明在设计这份问卷之前，本人阅读的文献以及经验大体是有帮助的。正确的经验总结到此，下面主要谈一下问卷发放及写作中发现这份问卷的不足。

由于第一次一个人完成这么大的论文，也是第一次设计问卷。这份问卷存在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不得不承认，这份问卷的设计还是稍显粗糙的。比如问卷中的几个问题在写作中根本没有用到。比如2、4、5题。这是笔者在构思设计阶段考虑不周密，对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思考不成熟，对研究思路认识不清晰的表现。但是正如陈向明¹（2000）所说，“通常，我们在设计阶段提出的研究问题只可能是一个初步的设想，今后随着研究进程的变化可能会发生变化，也可能因不适用而被完全抛弃。”因此，对上述问题的出现，笔者还是十分释然的。

另外一个问题，在问卷发放中发现问法不当，导致问题效度不高，不能反映出欲测查问题的真实性，比如第3题。这一题的设计初衷是想了解受访农户的详细家庭收入情况，从而了解其成员不同产业就业对该农户总收入的影响程度。但是，在实地的问卷发放中，发现这一问法存在问题。首先，受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普遍存在着“低调”，“不露富”思想的影响。受访者普遍把各种收入报得低一些，把各种支出报得低一些。其次，如果按照第3题这样按各部分统计收入，每部分差一些，则在农户总收入上就会相差甚

¹陈向明. 值得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7.

远。这是本人缺乏经验，没有事先预发放问卷，导致的问题。后来，发现问题的时候，问卷已经全部印刷出来，分给调查员开始发放了。受到时间，经济的限制，这时想改，为时已晚。不过再次浏览问卷后，发现这个问题可以靠第1题进行补救，并且得到的结果会比之前预计的更好。在后面的问卷调查中，我和其他调查员不再问农户各部分收入，只问农户每年的大概总收入，然后再根据第1题中农户劳动力资源从事职业的分布状况，考察其成员不同产业就业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这样做的依据是该村农户学历水平，外出务工从事职业同质性较高。虽然这样做，依然无法摆脱“低调”，“不露富”思想对问卷所得数据的影响。但是，由于考察的是农户成员不同产业就业人数与农户收入的关系，所以即使农户有意少报总收入，也不影响得出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影响最为显著的结论。这样的结果，不得不说是运气使然，歪打正着。

还有一个问题，问卷的设计造成了一些浪费。比如第1题中的家庭人口年龄学历情况统计表，就是完全不需要的。因为，在村委会的户口统计簿里，这些资料既详细又全面。但是，由于先做问卷调查，再去村委会进行资料搜集，所以，及至发现这一浪费情况，早木已成舟了。不得承认是本人考虑不周全，前期工作不细致造成的浪费。不过幸好只有200份问卷的发放量，没有耽误调查员与受访者太多的时间，也没有造成实质的损失。但是，这件事还是可以引以为戒的。试想，如果是全国性，或者地区性的大规模问卷发放，那必然会造成调查者与受访者时间，金钱上的大量损失。

以上就是本人对这份问卷一些问题的说明。也是本人第一次做问卷设计，调查的一些心得。

个人简历

陈曦，男，汉族，1988年9月生，广东深圳市人，中共预备党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

2012年9月—2015年6月，就读于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

2007年9月—2011年6月，就读于三峡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后记

在毕业论文完成之际，我深切地体会到“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的深刻内涵。此刻是我三年研究生生活的结束，也是我近二十年求学生涯的终结，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我虽然成长了许多，得到了些许历练，但这仍不足以让我满意。因此，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不仅要继续与书籍为伴，更要从实践中得出真知，继续不断锻造自己。

追忆过去的点滴，深刻认识到我能走到今天，是与我所遇到的人分不开的，正所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离开老师、同学、朋友和家人，我将不是现在的我，完成这样一篇论文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我有太多感慨涌上心头，有太多感谢亟待表达。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文小勇教授。文老师对本论文的研究给予了悉心的指导，从选题、定题、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重要学术观点和研究动态的关注、论文撰写的规范性和逻辑结构要求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具体、明确和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令我的研究思路得以启发的同时，更为文老师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科学、真知追求的学术精神所感染和激励。另外，文老师在我博士报考的问题上，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以及科社专业的其他各位老师，在平时的学习与论文写作等方面离不开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尤其在预答辩和平时的交流中老师们给我的建议，使我十分受益。我要感谢研究生部的各位老师，在研究生阶段的实践与生活中，他们给了我很多关心和照顾。我要感谢我的同学们，想起这几年来的亲密的友情，以及将要分开的离愁，心里既有喜悦也有云翳。黄华园有我们太多的回忆，与舍友刘成醉饮月夜归，与专业同学围炉听雨吃火锅，与同窗们嬉戏打闹……正是有他们的陪伴，才让我这三年过得如此快乐，如此多姿多彩。不知经年后的重逢是否还能再拾起今时今日的感觉。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不仅给予我生命，还教诲我不断地追寻人生的梦想。每当想起读了这么多年书，对家里只有索取无甚贡献，心里就十分的酸楚。他们在培养我的过程中，褶皱了皮肤，斑白了鬓角。每当看到母亲拿着梳子把父亲的白头发一缕一缕的染黑，我就在想，谁会相信他们也曾年轻过，他们也曾像我一样意气风发呢？“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对于我的父母，我不仅感激他们用青春对我的哺育，也感激他们让我看到时间的宝贵，年华的易逝。最后，我要感谢我亲爱的女朋友。她陪

伴我七年有余，每每在我低落的时候鼓励我，在我生气不平的时候抚慰我。尤其是在我写论文和考博压力最大的时候，失眠简直折磨得我无法正常学习。可是一旦回到她的怀抱，便能感到平静，安全。

陈 曦

2015年5月于广州黄华园